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小學生新視野百科知識叢書

國家新視野百科知識



国家

中国共产党“一大”始末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1920年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这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欲去上海，李大钊曾陪送至天津，二人相约分别在南北方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又名吴廷康）来华。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里，魏金斯基和李大钊多次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4月，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共产国际代表的来华，促进了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直接联系，促进了建党工作的进行。

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召开会议，与会者一致通过成立中国共产党，并推陈独秀为党的书记。主要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等。这就是后来人们通常讲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叫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当时，李大钊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从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也陆续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日本、法国的留学生和侨民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虽然不是全国性的，但它肩负着发起、筹备和组织全国性政党的重任，是建党活动的中心，实际上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孙中山、陈炯明的邀请，并取得李大钊和上海党组织的同意与支持后，赴粤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赴粤后，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后李汉俊辞职，由李达继任。李达为筹备组织党的“一大”召开，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克·斯尼夫列特）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来到上海。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也同期到达上海。他们和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了解到了自魏金斯基来华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筹建的一些基本情况，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李汉俊根据党的发起组织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量，一致认为条件基本具备，确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李达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的地方组织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党员，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大会。大会原定6月20日召开，但直到7月23日各地代表才全部到达。代表们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博文女校（现太仓路127号）。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

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 13 人，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还有陈独秀的指派代表包惠僧。李大钊、陈独秀因故未出席。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因远隔重洋也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出席了大会。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张国焘被选为主席（因李达不喜交往，与马林接触后彼此关系不融洽），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

在 7 月 23 日晚的第一次会议上，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大会的意义，提出了大会应讨论和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共产国际代表向大会热情致词。

24 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情况，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

25、26 日，休会两天。由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会议文件（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27 至 29 日，举行了第三、四、五次会议。代表们集中讨论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会议文件草案。虽各有己见，但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未出席这三次会议。

30 日晚，举行了第六次会议。由于马林说话声音过高，会议开始不久，突然撞进一位不速之客，自言“走错了地方”，代表们在马林的建议下，立即中止会议迅速离去。十几分钟后，一群法国巡捕蜂拥而至，包围和搜查了会议地点。当晚，一些代表汇集到渔阳里 2 号李达的寓所，他们商量，必须改换会议地点，恰好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因此决定第二天到离上海较近的嘉兴县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

7 月 31 日（一说 8 月 1 日）清早，代表们分两批从上海乘火车去嘉兴，只有陈公博没有前往，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太引人注目也没有去参加。到了嘉兴，由李达夫人安排，弄了一只画舫。上午 11 时左右，代表们就到了南湖，在画舫上召开“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麻将牌，船的中舱桌上还摆着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此时，天空下起了小雨，游客稀少，条件十分有利。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党纲明确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这是党的第一个决议。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下午 6 时左右，大会胜利闭幕。代表们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上海。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党历次党章上的“第一”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党的第一个党章。它分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六章，第一次规定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执行上级命令等组织纪律，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交纳党费。

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是我党首次修改党章。它第一次明确规定，发展党员必须有“预备期”（时称“候补期”，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次规定支部为党的基层单位，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支部，并把党内最高职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最早称中央局书记）改称总书记，这也是我党首次有总书记的称呼。

1927年6月1日，受党的五大委托，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该章程共有12章、85条，是到目前为止我党条目最多的党章。它第一次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概念，第一次提出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并首次规定入党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

1928年6—7月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通过的党章，是党唯一在国外制定的党章。它共有15章、53条，是到目前为止我党条目最多的党章。

1945年4—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首次明确地把党的性质写进党章，单列了总纲部分；首次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正式设置党的主席一职；第一次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四大服从”完整地写进党章，并首次在党章中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明确指出党员必须精通业务。这个党章，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指导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是我党成为执政党后制定的第一个党章。第一次增加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内容，第一次确立“集体领导”的条文。同时，为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确立起来的新形势，首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写进党章；首次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载入党章（后来“四化”内容略有调整）。此党章还首次明确共青团与党的关系是助手关系。

1969年党的九大和1973年党的十大分别通过的党章，因指导方针错误，其主体部分也错了。九大把林彪作为党的主席接班人写进党章，在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都是第一次，是对民主集中制的践踏。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强调发挥党的

“战斗堡垒”的作用。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首次载入入党誓词，首词专列了党的干部一章，还对党的组织制度作了一些新规定，如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在中央和省一级设立党的顾问委员会等。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对于党章只通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一次没有做修改党章的报告。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只有英俄两个版本，唯独没有中文版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英俄两个版本的“一大”党纲又是怎样发现的呢？

早在1937年——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16个年头，尼姆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中共第一个党纲到底有些什么内容，很长时期是个谜。

谁能料想，揭开这个谜底的竟是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1960年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用英文打印，题目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署名“ChenKung—po”。经韦慕庭教授考证，Chen Kung—po即陈公博。陈公博的这篇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经过，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作时间1924年，距中共“一大”召开仅隔3年。这篇论文后面还收入6篇重要文献，其中第一篇便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由论文可看出陈公博是中共早期党员，并作为“一大”代表出席了那次重要会议。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陈独秀）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从陈公博论文中发现的英文版中共“一大”党纲，随着学术交流传到中国，中央编译局将其译成中文，人们才了解到中共“一大”党纲的全貌。这就是英文版“一大”党纲的由来。

俄文版“一大”党纲则是近几年人们才见到的。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

给中共中央一批当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材料，其中有俄文版的“一大”党纲。1980年，中央档案馆将其译稿编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一书，才得以公开发表。俄文版的“一大”党纲与英文版的“一大”党纲具体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在个别措词上因两种语言的习惯不同，翻译成中文后略有差别。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指出：“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党纲严格地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指出只有承认党纲和党的政策，并愿做忠实的党员的人，才可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纳新党员必须履行严格的入党手续，必须在一定的组织内生活。党纲规定：“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实行上级对下级的严格监督，强调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观念。这与以往涣散的党派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美国发现的中共了早的六个重要文献

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论文还有6个附件。

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它全文收入附录的6篇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2.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3.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4.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5.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6.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其中1.2.4.5.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党旗

中国共产党党旗底色为红色，旗面的左上角为黄色的锤子、镰刀。图案中旗面的红色象征着革命；锤子和镰刀是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图案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旗的规格：

1. 旗面横为120厘米，竖为80厘米；
2. 锤子、镰刀的图案居旗面左上角（四分之一）处的中间，其直径为30厘米；
3. 旗裤为白色，宽6.5厘米，不包括在整个旗面尺度之内；

4. 旗杆及矛头的式样同军旗。

入党誓词小史

我党红军时代的入党誓词比较简要：“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入党誓词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的入党誓词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在党章中载入党誓的誓词，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确定过程

多年来，不少人以为我党从酝酿建党起，党的组织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命名的。其实不然，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由社会党、共产党，直至中国共产党的演变过程。

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党成立的第一个早期组织，标志着建党的开始。这个小组从1920年5—6月开始酝酿，到9月上旬成立的初期，是以“社会党”命名的。曾参加我党早期创建工作的张申府回忆：“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大约是1920年8月上旬正式成立的，成立的时候叫的是社会党。”在1920年9月1日出版发行的《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在《对时局的我见》一文中提到了“吾党”，并使用了“社会党”这一名称。

为什么在这一阶级使用了“社会党”的名称呢？这是因为：第一，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在宣传十月革命时，人们将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党。第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初期，成份比较复杂。他们当中虽然大多数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也有一些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如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张申府在谈及叫“社会党”的原因时就说：因为有这些人参加，“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党的上海小组的主要组织者陈独秀，当时对党的组织应保持高度的纯洁性认识不高，只希望争取较多的人参加组织，所以采用了“社会党”的名称。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因为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小组成员，在思想认识上分歧越来越大，相继退出了小组的活动。这时，陈独秀给李大钊、张申府写信，介绍了上海

的建党情况，并与他们商量，党的组织究竟采用什么名称好，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李大钊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已改称共产党了，其它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已经或者正准备改称共产党，因此还是叫共产党好，而且征求了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意见。此后由张申府执笔给陈独秀写了回信，告诉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此信约在 8 月下旬从北京发往上海。不久，陈独秀即回信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照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从陈独秀在 9 月 1 日发表的文章仍称社会党的情况看，使用共产党的名称，当在 1920 年 9 月 1 日以后。1920 年 11 月 7 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创办了我党的第一份正式刊物。这份刊物就是以党的名称共产党定名的，它就是著名的《共产党》月刊。该刊发表的短言一开篇就说：“我们共产党。”这就说明，约在 1920 年 9 月上旬至 11 月 7 日前党的组织叫共产党。

最早使用中国共产党一词的是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蔡和森。他在 1920 年 9 月 16 日从法国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明目张胆地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但这仅仅是一个提议，并不是给国内已经建立的党组织确定名称，加上这封信传到国内已是年底，因而对国内党的组织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没有产生影响。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是 1920 年 11 月 7 日之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作为党的发起组，担负了筹建统一组织的任务。为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 1920 年 11 月制定党的第一宣言，这个宣言被明确成为《中国共产党宣言》。另据李达回忆：“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开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手段……”。以上两份材料都采用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提法，从而说明我党在 1920 年 11 月 7 日之后开始使用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1921 年 7 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我党的第一个党纲。党纲明确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到此，我党的名称就最后确定下来了。

中共“一大”的秘密保卫者

秘密保卫中共“一大”顺利举行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就是“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

1921 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代表协助下，为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着紧张秘密的筹备工作。当时，李达是代理书记，他和李汉俊成了“一大”的具体筹划者。

会前，李达把安排各地代表来沪食宿、选择开会地点、安全警戒的工作交给了王会悟。年仅 23 岁的王会悟为了完成好这一光荣使命，连日明察暗访，悉心优选会议地点。最后，她选中了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恰巧李书城（国民党一位知名军事部长，追随孙中山的左派）外出避暑，因此认为在这里召开会议是最安全的了。

开会地点确定后，王会悟又忙着寻找代表住处。当时正值学校放暑假。她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商借了一个统厢房和统楼，共三间（后向该校捐款20元），并以“一文化团体在上海开学术讨论会”为由，巧妙地搪塞了黄校长好奇的追问。她还请了一个可靠的校役每天为大家做饭，同时不让外人接近住处。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李寓楼上李书城书房里秘密举行。7月30日，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代表们陆续赶到会场，王会悟仍像往常一样在楼下后门放哨。当马林正即席演说时，突然，发现一个穿灰布长褂探头探脑的人从厢房里跑出来，张目四看后直奔楼上。王会悟立即上前追问。但是此人不问青红皂白直闯会场。王会悟顿生疑窦，她飞速跑上楼，把坐在门口的俄语译杨明斋轻声唤出……

当坐在临街窗户下的马林听完杨明斋的翻译后，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说完便收拾好摊开的文件，率先撤离会场。情况突变，会议不能继续进行，大家分别从前门迅速散去。

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两辆警车果然呼啸而来，一群全副武装的巡捕和侦探，直扑楼上那个会场……

由于王会悟的敏锐和机警，代表们安然无恙。

中共“一大”不能在原址继续举行，代表们相聚在李达家，商量转移会址问题。众说纷纭，难以定夺。在一旁的王会悟又献上一个锦囊妙计：“我在嘉兴读过书，熟悉地理环境。南湖四面环水，湖畔一片芦苇，可用画舫游湖作掩护。万一发生意外，还可分散到我同学家里，比较安全。大家同意王会悟南湖续会的方案，并当即决定由她先行到嘉兴安排一切。

王会悟和部分代表提前到达嘉兴。下车后，她首先进城，在张家弄（今勤俭路）鸳湖旅馆（现人民戏院处），以刚游完西湖路过嘉兴顺便旅游南湖为由，订了两个房间，并通过旅馆花了8块大洋租好一只中型游船和一桌菜。8月2日上午7点35分，留在上海的代表打扮成商人、绅士、学生、游人，分散上了开往嘉兴的快车。早已在嘉兴站等候的王会悟把代表接到旅馆，稍加休息，就从东门狮子汇渡口上船。临行前，王会悟还特意借来一副麻将。

王会悟租到的那艘画舫，当地人叫单夹弄丝网船，长16米，宽3米，舱内高2米，分前、中、后三舱。会议在中舱举行。舱内置八仙桌、座椅、方凳，靠壁设座塌。船身涂满紫光漆，绿色窗帘，一眼望去精细、漂亮。

环湖一周，王会悟选好最安全的停泊处，催促船娘将船撑至烟雨楼东南约200米的僻静水面上。

11时左右，代表们围坐八仙桌，又开始了紧张秘密的建党讨论。此时，身穿斜襟短衫、黑丝绸裙子的王会悟佯装游湖，坐在船头放哨。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若有船划近，就用纸折扇笃笃敲船板，提醒代表警惕。这时，船舱里就会立即传出劈啪作响的搓麻将声，以掩人耳目。

这天是阴天，时夹蒙蒙小雨，整个湖面上只有四五只游船。王会悟在跟

船娘拉家常中就已了解了其他船上游客的身份。会议开得十分顺利，到下午5点左右，突然，从远处驶来一只小汽艇。王会悟怀疑是巡逻艇，便迅速发出暗号。代表们闻声，随机应变地喊着“七索”、“八万”、留声机也播着《打渔杀家》等京剧名段。后经王会悟打听，方知这是城里一位绅士游湖的私艇，代表们又放心开会。

“一大”南湖会议在游船上开了7个多小时，至下午6时许完成了全部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大”会场的不速客

1921年7月30日晚上，那个突然闯进中共“一大”会场的侦探究竟是谁？70年来几乎无人知晓。上海作家叶永烈在其所著《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作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便于1990年前往薛寓拜访。薛耕莘先生告知，那个穿灰布长衫闯进“一大”会场的侦探名叫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3年私塾。程子卿不会讲法语，但膂力过人。他与黄金荣是结拜兄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后，先是做巡捕，后升为探长。薛耕莘先生至今仍保存着一张他当年穿警服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照片，从照片上也可看出程子卿身体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共“一大”之事（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共“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当时，他曾记录程子卿的谈话内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看到当年他记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件事，他记得很清楚。

据悉，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这样，解放后经一位重要人物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他于1950年病逝于上海。

党的“一大”会址为何遭搜查而无恙

1921年7月30日，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址被敌人发觉后遭到搜查，但是会址却未遭任何破坏，房主人也没有被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当年望志路106号不仅是李氏兄弟的寓所，同时还是《新时代丛书》社通讯处。《新时代丛书》社，是由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陈望道等15人于1921年6月发起成立的专事翻译的出版机构。同

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曾登载《新时代丛书社编辑缘起》，谈到该社出版宗旨是“增进国人普通知识”，编辑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之知识”，通讯处“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即望志路108号，与隔壁106号同为李家所住）。筹备党的“一大”时，因望志路106号主人李书城同情革命、李汉俊参加革命，又鉴于这里是出版机构公开通讯处，有进出、集议之便，所以设会场于此。在会议举行过程中，会址突然受到巡捕搜查时，李汉俊即泰然自若地以《新时代丛书》为题与之周旋。巡捕走后，李汉俊对代表包惠僧等讲当时情况说：“他们问我开什么会，我说是北京大学的几个教授在这里谈天，顺便谈谈编写现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什么会。”既然是出版机构的通讯处，编辑成员在这里会谈不足为奇，所以巡捕们搜查得很马虎，“写字台抽屉内有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没有来得及收藏，他们竟没有发现。”由此可见，当时党的“一大”会址之所以安然无恙，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新时代丛书》社通讯处的掩护。

我党历史上中央和地方主要组织机构、体制

党的历史上的中央领导机构体制主要有：

中央局。党的一大选举组成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称书记。四大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称总书记。

中央执行委员会。党的二大、三大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为委员长。

中央政治局。党的五大、六大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均为政治局总书记。

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是党的八七会议选举产生。第二次是1931年6月经共产国际代表指定。

各中央局。八七会议以后开始设立。1927年9月成立北方、长江、南方三个局，曾先后撤销，1930年又重建。1931年1月成立苏区中央局。1936年7月成立西北局。1938年11月建东南局。1939年1月成立中原局。1941年5月，东南局、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1945年8月成立晋察冀中央局、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5月合并为华北局。1946年4月成立上海局。1945年9月成立东北局。1949年11月建西南局。全国解放初期，曾设立过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中央局。

前敌委员会。党中央1927年领导南昌起义时，由周恩来等同志组成前敌委员会。1928年11月党中央指定毛泽东等同志组成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亦称井冈山前委。解放战争中，为指挥重大战役，也曾设立过前委。

中央分局。先后有1934年设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1935年设立的中央江西分局，1938年设立的中央东南分局、山东分局和晋察冀分局，1942年设

立的中央晋绥分局、太行分局，1943年设立的中央华中分局、1944年设立的中央平原分局，1945年设立的中央晋察热分局、北满分局、西满分局、东满分局、华南分局等。

中央主席。1945年4月党的七大开始在中央委员会设主席，兼政治局主席，直至十一大。十二大改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央副主席。党的八大开始设立，直至十一大。

党的历史上先后设置过的地方组织主要有：

区执行委员会。1921年11月中央局通知各地成立，当时有广东、武汉、北京、上海等区执行委员会。

地方委员会。1921年底成立中共北京、上海地方委员会。党的三大召开以后又成立了中共长沙、唐山、天津、山东、江西地方委员会。党的五大以后称省委。

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各地领导武装起义的组织。主要有湖南的湘鄂赣边特委，湘南、湘中、湘西、湘东、湘西北特委，湖北的鄂南、鄂北、鄂东、鄂西、鄂中特委，广东的东江、北江、西江、南路、琼崖特委，江西的赣东北、赣南、赣西、吉安特委，还有闽西、豫南、皖北、徐州、淮安特委等。

历史上中共中央的驻地

上海 1921年7月—1922年10月

北京 1922年10月—1923年“二七”惨案后

上海 1923年“二七”惨案后—1923年6月“三大”前

广州 1923年“三大”前—1923年9月

上海 1923年9月—1927年4月

汉口 1927年4月—1927年10月初

上海 1927年10月初—1933年春

江西瑞金 1933年春—1934年10月

1934年10月—1935年12月随红军长征

陕西瓦窑堡 1935年12月—1936年7月

陕西保安 1936年7月—1937年1月

陕西延安 1937年1月—1947年3月

1947年3月—1948年3月，随军转战陕北

河北西柏坡 1948年3月—1949年3月，25日进驻北京

党中央何时进驻中南海

1949年1月31日正式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联合办事处”主任

叶剑英和彭真等同志，经过反复权衡考虑，为党中央、毛泽东选定了中南海作为办公和居住的地点。

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乘汽车驶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后改乘火车于25日晨抵达北平。当天下午，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此后，中央及军委大部分同志即临时在香山办公。毛泽东暂住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副主席忙于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及筹备政协会议等事宜，频频来往于香山与城区之间，刘少奇副主席不久即去前苏联访问。

1949年6月15日，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的日子。毛、周、朱等领导人由香山前往出席会议。从此，他们就一直工作和居住在中南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也同时进驻中南海办公。对此，当时任警卫处处长的汪东兴，于1949年7月20日在关于警卫工作的报告中，曾有如下载载：“自6月15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下山办公以后，香山各单位人员亦随着继续下来……。”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第一个统一战线组织

党的二大曾提出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以进行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还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1922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共产党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民主主义大同盟，并于20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召开了筹备会，推举邓飞黄、缪伯英、罗澄、范鸿劫、刘仁静、高尚德、蔡和森等为筹备委员，杨廉为主任，同月24日，民主主义大同盟正式宣告成立。简章规定同盟的宗旨：“打倒军阀”、“维护民主主义”。选举邓中夏、杨廉分别为同盟主席、副主席，并设立了庶务、交际、宣讲、编辑、法律、劳动、筹款等股式委员会。此后，在广州、上海、山东、江西、湖南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广泛团结了广大群众，推动了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

历史上的台湾共产党

当大陆在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后，台湾也曾出现过无产阶级政党——台湾共产党。遗憾的是：台湾共产党历时3年便告夭折。

当时，台湾一些在大陆和日本求学的进步学生，逐步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他们一方面在台湾社会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则积极同中共、日共发生联系，寻找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在上海的台胞谢雪红、林木顺参加了“五卅”运动，会见了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并受中共中央的推荐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他们学成归来，受共产国际指令：在日本共

产党指导下开展台湾共产主义运动。

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个神父公馆内召开了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暨台共“一大”。

由于台共内部出现宗派问题和关门主义倾向，斗争环境艰难，遂同日共、中共先后失去联系，加上共产国际的一味指责，使当时的领导人谢雪红产生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1931年3月20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淡水由共产国际使者潘钦信主持召开了“特别会议”，作出了重新整顿台共的决定，通过了新的政治纲领，同时，台共从日共的“民族支部”的地位上升到共产国际直属支部的地位。此后，在不断高涨的工农运动中，使台共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前景。但是，台湾日警的血腥镇压，使大多数台共党员被捕入狱。到1931年秋，台共实际上已被消灭。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 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简介

一大。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幕。有七个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委托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

二大。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党员195人。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中夏、向警予、李达为候补委员，并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组织委员。

三大。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等30余人，代表全国党员420人。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邓培、张连光5人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了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成员，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

四大。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维汉等20人，代表党员994人。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5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

五大。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代表有陈独秀、蔡和

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 80 人，代表党员 57967 人。大会选出 29 名中央委员和 11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继续担任总书记。

六大。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在前苏联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 142 人，代表党员 130194 人。大会选举中央委员 23 人，候补委员 13 人。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 7 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7 人：李立三、彭湃、杨殷、罗登贤、关向应、徐锡根、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5 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 3 人：李立三、徐锡根、杨殷。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七大。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举行。代表 547 人，候补代表 208 人，代表 121 万名党员。大会选出中央委员 44 名，候补中央委员 33 名。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八大。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在北京举行。代表 1026 人，侯补代表 107 人，代表全国 1073 万党员。大会选举中央委员 97 人，候补委员 73 人。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 17 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候补委员 6 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6 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九大。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在北京举行。代表 1512 名，代表党员约 2200 万人。大会选出中央委员 170 名，候补委员 109 名。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 21 人：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冲；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5 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十大。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 1249 人，代表 2800 万党员。大会选出中央委员 195 名，候补中央委员 124 名。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 21 人：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

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人：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委 9 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十一大。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代表 1510 名，代表全国 3500 多万党员。大会选举中央委员 201 名，候补委员 132 名。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 23 人：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飫、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候补委员 3 人：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委 5 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十二大。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正式代表 1545 名，候补代表 145 名，代表全国 3960 多万名党员。大会选出中央委员 210 名，候补委员 138 名；十二届，中全行选举：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民仲勋、邓力群、杨勇、余秋里、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最早提出“七一”为党的生日的是谁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成立大会是 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31 日在上海望志路 106 号（现兴业路 76 号）举行的，因帝国主义侦探干扰，大会最后一天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进行。这次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据现有资料看，最早把“七一”定为党成立的纪念日，是毛泽东同志 1938 年 5 月在作《论持久战》演说时提出的，他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1941 年 6 月 3 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周年纪念指示》中，正式确定“七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文件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从这一年开始在全党范围大规模纪念“七一”。1949 年 6 月，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开头指出：“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了”。从毛泽东同志使用“表示”这个词，可以说明“七

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七一”作为党的生日，不应受“一大”召开日期的局限，因为“七一”这个纪念日，在国内外、党内外已有深远影响。

党的报刊之“第一”

由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在1918年登载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成为我国第一个宣传前苏联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该刊于1920年9月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又于1921年7月党的一大确定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由李汉俊、陈望道担任主编。这是我党第一个公开发行的理论刊物。

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的《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是我党第一个党内刊物。该刊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党的基本政治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和共产党的有关知识等。它秘密发行全国，最高发行量达5000份，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必读材料之一。该刊于1921年7月7日停刊，共出6期。

192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劳动者》周刊，由陈独秀参加编辑工作，主要撰稿者有李汉俊、陈望道、李震瀛、陈为人等。该刊旨在向工人群众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动员工人联合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是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

1921年9月1日在上海创办的人民出版社，由中央局宣传部长李达主持工作，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它出版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资本论入门》等多种重要书籍，为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开端。1923年，人民出版社与新青年社合并。

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办的《向导》周刊，主要刊载时事、政治评论等文章，以宣传党的纲领、方针、政策，指导群众政治斗争为任务，是我党第一个政治性的机关报。1922年10月，迁到北京出版，以后又分别到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出版；先后由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任主编。该刊于1927年7月停刊，共发行201期。

1923年11月30日发刊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是我党第一个党内机关刊物。它发放范围很小，内容以登载党内文件、报告为主。

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于1925年6月4日在上海创办的《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并为社论主要撰稿人，是我党主办的第一张日报。报名也是根据瞿秋白“哪有公理？只有热血！”一语而来的。报纸只出版发行了24期，便于当月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而停刊。但它确已起到了揭露国内外反动派罪行、鼓舞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斗志、推动五卅运动发展的作用。

1928年11月20日创刊的《红旗周报》（原名为《红旗》），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报，《红旗周刊》共出版发行了126期。1930年8月2日停

刊后，于当月的 15 日与《上海报》合并定名为《红旗日报》。1931 年 3 月又恢复为《红旗周报》。

1931 年 12 月 11 日在江西瑞金创办的《红鱼中华报》，是党中央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大报。在长征开始前已出版了 240 期。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于 1935 年 11 月 25 日在瓦窑堡又接着原来编印的期号继续出版。1937 年 1 月 27 日，党中央把《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1939 年 2 月 7 日后，仍恢复为党中央的机关报。

1941 年 5 月 16 日在延安创刊的《解放日报》，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对开大型日报。该报是由原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刷新版）和《今日新闻》合并改版出刊的。1942 年 9 月起，兼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毛泽东同志经常为该报撰稿、改稿，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曾在该报发表。1947 年 3 月，报社随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后，出至当月 27 日停刊。前后共出版发行了 2130 期。

1949 年 5 月 28 日，《解放日报》又在上海创刊，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从 1954 年 12 月 1 日至今，一直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

1938 年 1 月 11 日在汉口创刊的《新华日报》，是我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党的机关报。10 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汉口后，报纸随八路军办事处迁至重庆继续出版。至 1947 年 2 月 28 日被国民党政府强行封闭，共办了 9 年零 2 个月的时间。

1948 年 6 月 15 日在华北解放区创办的《人民日报》，原为中共华北局的机关报。初办时在河北平山编印出版发行，后移至石家庄市，1949 年 3 月又迁至北京出版发行。同年 8 月，建国前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毛泽东同志曾多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这份报纸是我党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现期发量在 500 万份以上，也是当今世界上的十大报纸之一。

我党创办的第一个新闻研究机构

1941 年 7 月，我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由当时党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兼任。副院长是范文澜。中央研究院的工作重点是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中央研究院共分 9 个研究室，新闻研究室是其中之一。新闻研究室主任由中宣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兼任。全室有近 20 名同志。

新闻研究室注重对现状的了解和研究，当时确定的课题或研究对象是：新华社、边区新闻事业现状；《解放日报》、大众读物社、《边区群众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华北根据地报纸事业概况；《晋察冀日报》、《晋西北抗战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青记协会、中央

社、大后方报纸事业概况及重要人物，国民党及敌伪的出版发行政策。

延安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是我党在进行武装斗争的 28 年历史中，创办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新闻研究机构。

我党第一份外文刊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竭力将中国拉向内战深渊，并利用国民党报刊在国内外大造反动舆论。我党为了便于在国际上展开争取和平民主的舆论斗争，于 1946 年 5 月 17 日创办了《新华周刊》。这是一份行销世界各大城市的 16 开英文刊物，也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份外文刊物。

《新华周刊》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筹办起来的，由乔木（即乔冠华）同志任总编，关振群、孙一新任编译，由法国商人密须里埃承担印刷，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兼翻译龚澎负责发行，编辑部就设在上海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23 号。

《新华周刊》及时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当时所发生的重大政治新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对国共和谈的立场，介绍宋庆龄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计划，揭露蒋介石挑动内战的阴谋。

《新华周刊》内容丰富，通俗生动，深受读者欢迎。国民党当局对此惶惶不安，犹如芒刺在背，指使上海反动当局于同年 6 月 5 日查禁了《新华周刊》。

《新华周刊》从创刊至封闭，前后只出版了 3 期，但它在当时的宣传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锻炼了一批对外宣传人才。

党中央创办过的报刊

我们的党一向都十分重视报刊的作用。党把自己的报刊看作是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和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早在 1919 年，毛主席在湖南领导革命运动时，就创办了《湘江评论》。1920 年，党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开始作为党的公开宣传刊物，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为党的秘密刊物。与此同时，我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

从党的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创办的报刊有《向导》周报、《前锋月刊》、《新青年季刊》和《热血日报》。《向导》周报是我党首办的中央机关报，于 1922 年 9 月在上海创刊，1927 年 7 月停刊。毛主席著名的论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发表在《向导》周报第一百九十一期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的机关报刊有《布尔什维克》、《红旗》、《红色中华》、《斗争》周刊、《解放》周刊。其中，《红色中华》

(1931年12月11日创刊)是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大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7年1月29日,党中央把《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同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办《解放》周刊。这两个报刊着重宣传了党的争取民主,实现抗日的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办的报刊除了已有的《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以外,还创办了《群众》周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群众》周刊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在武汉出版,1949年5月10日停刊。

《新华日报》创刊于1938年1月11日,开始也在武汉出版,后迁到重庆,1947年3月1日,被反动派封闭。《群众》和《新华日报》是我党成立以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刊,它们象两把利剑,直插进国民党反动派的胸膛,深受我国人民的热爱和各国兄弟党的重视。《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6日创刊,1947年3月27日停刊。在《解放日报》停刊期间,新华通讯社代替了中央机关报刊的作用,不只发布新闻通讯,而且也经常播发社论、评论。其中有许多是毛主席和中央其它负责同志写的。1948年6月15日,党创办了全国性的《人民日报》。全国解放以后,党的报刊得到空前的发展。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1958年6月1日,党中央又创办了《红旗》半月刊。

我党创办的第一所戏剧学校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戏剧学校,是1933年开始创办、1934年正式开学的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为李伯钊,校址设在瑞金叶坪附近的一座古庙里。

该校设有戏剧、舞蹈、歌咏等班,学员都来自红军各部队的战士和苏区地方的文艺骨干。教员不仅有我党各方面有经验的同志,瞿秋白也在这里讲过课。

由于学员文化水平和年龄参差不齐,开始时进行简单的基本功和动作训练,边教学边排练。排练好话剧、小歌剧、小舞剧、活报剧等节目后,就到部队、乡村进行慰问演出。就这样,高尔基戏剧学校先后培训出一千多名学员。这些学员活跃在苏区各地,为我党的文艺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党的第一部党史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史,是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做的讲演,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共分绪言、意义、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的使命三部分,主要叙述了党的四次代表大会以及党创立初期的活动和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概况;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与发展和国民党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最后,对党六年来

的历史作了总结，把党的成就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阐述：在于党对无产阶级的引导，使之站在民族革命的领导地位；在于对民族革命、对农民、对军事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在政治上成为全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族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比较系统地叙述党的历史的文献。

第一面正式党旗的诞生

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早在红军时代，就有新党员站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的记载。当时的党旗是各级党组织模仿联共布尔什维克党旗的样子自己制作的，规格和样式各不相同。1942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中共党旗形式的决议，决议中说：“决定中共党旗样式宽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并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不久，第一批中共正式党旗就在延安诞生了。

历史上第一次“七一”纪念活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活动，早在1936年就开始了，而把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来纪念则始于1938年。这一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发表著名讲演《论持久战》中提到：“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在他演讲后的第9天，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当年的7月1日至7日，为“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国共产党17周年纪念宣传周”。于是，我党历史上首次规模空前、隆重盛大的“七·一”纪念活动就在延安展开了。按照统一安排，7月1日为工人日，白天工人举行集会。工人宣传队走向社会开展活动，晚上召开了“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17周年纪念大会”。7月2日为学生日，7月3日为武装日，7月4日为妇女日，7月5日为青年日，7月6日为商人日，7月7日为抗战建国日。整个纪念活动，隆重庄严，节俭实在，催人向上。

党史上第一支妇女武装

1930年8月，为了适应当时的海南革命斗争形势，也为了发扬和表彰南国妇女强烈要求挣脱反动枷锁、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的革命精神，经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和其他特委委员研究同意，在万泉河畔的琼海县组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支妇女武装——女子军特务连。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誉的红色娘子军。当时全连编制120人，除了一位司号员是男战士之外，其余全部是女同志。连长为庞琼花、指导员是特委委派的王时香（后被捕变节）。肃反时，连长庞琼花被怀疑为社会民主党成员而被撤职，由担任排长的冯增敏继任连长职务。

女子军特务连最初的主要任务是：在特委和红三团根据地与敌占区交界处站岗放哨，保卫苏区。有时也随军上前线打仗。她们作战骁勇，而且善于做群众工作，受到当地农民的称赞。

1932年8月，琼崖绥靖委员公署委员陈汉光率领一个警卫旅的军队，大举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特委领导红军主力和女子特务连撤退到母瑞山。敌人又跟踪围剿，激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女子军大部分英勇牺牲，连长、指导员等八人被俘。至此，女子军特务连宣告解体。

解放后，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冯增敏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会上，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她，毛主席还送给她一支冲锋枪，勉励海南妇女紧握手枪，保卫南中国。

党领导的第一支妇女正规军

1932年末，红四方面军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后经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于1933年3月在通江县城成立。这是党史上第一支红色妇女正规武装。该独立营由400余名红军女战士组成，军事教官为秦基伟，营长由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宣队队长苏凤担任，妇女独立营成立不久，便在通江县鹰龙山打了一个漂亮仗，消灭了川军田颂尧一个团的残部，受到了总部首长的嘉奖。

曾任妇女独立营营长（后升任独立团团长）的苏凤原名陶万荣，湖北麻城县人，生于1916年5月。她13岁加入共青团，1930年春调到中共麻城县委工作，同年秋天进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西征。1933年被调任妇女独立营营长时年仅17岁。

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妇女运动讲习所

1926年9月，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人的建议下，由区委妇委书记蔡畅、妇委委员邓颖超与时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的何香凝研究确定并进行筹备，创办起了广州妇女运动讲习所。何香凝兼任所长，蔡畅任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9月15日正式开学。该所聘请恽代英、邓中夏、彭湃、邓颖超等为教员。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共100人。毕业后，她们分别到各地发动和指导妇女运动。

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

在共青团发展史上，全国第一个团组织是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探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3月，

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中国名字叫关廷康）和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等人来中国，同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们除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指导各地建党外，还进行了建团工作。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最年轻（21岁）的党员俞秀松出面，同袁振英（震瀛）、叶天底、金家凤等8个青年一起，于1920年8月22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团的书记。不久，建立了团的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7弄6号）。杨明斋参加了团组织的创建活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时期，党为了培育它茁壮成长，党的上海发起组的成员都加入了青年团。

上海青年团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第一，举办外国语学社，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到苏俄和欧洲、日本等地学习。第二，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很多团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向工人进行教育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与领导工人运动。第三，发展团的组织，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计有李中、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卜世奇等。1920年到1921年间，团员达200人。第四，带动了各地青年团的建立。上海青年团建立后，便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和文件，要求各地进行建团工作。在各地建团过程中，上海团组织起了一定的发起和指导作用。

上海青年团成立后的出色活动，受到青年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的称赞，被誉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并被邀请派代表参加192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海团书记俞秀松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中国共青团之最

中国最早的团组织，是1920年8月建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具体负责组织的。

全国性的团组织最早是在1920年冬建立的，当时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临时中央局办公地址设在当时上海的霞飞路渔阳里6号，中央局书记为俞秀松。

团中央最早的机关刊物，是1922年1月创办的《先驱》半月刊。

确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名称，开始于1925年1月。这年1月26日至30日，即在党的“四大”刚刚结束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区别于第二国际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表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大会决定和第三国际领导的各国青年团组织的名称相一致，把自己的组织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共第一个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

反对贪污腐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不少人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1926年8月4日发布的《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却鲜为人知。

通告的主要内容是：“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一年以来，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这些投机分子尚不能动摇我党的政策，只是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此种分子各地均有发现，……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这个通告发布于大革命的高潮中。在这个革命的洪流中，社会上的投机分子，甚至反动政客等“也来敲C.P（即中共）的门”，造成了“党员数量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的情况，发生侵吞公款、化公为私等贪污行为，败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从通告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内的贪污腐化现象不是我们党固有的。这个通告不仅深刻分析了贪污腐化给党的事业和党的肌体带来的严重危害，而且表明了党对贪污腐化分子坚定不移斗争的立场和方针。

中国革命史之“第一”

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1899年4月，在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上的《大同学》一文中。

第一个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李大钊。从1918年7月起，李大钊写了《德俄革命之比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

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1920年，全国七、八个城市举行了纪念活动。

第一本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由陈望道全文翻译。

第一次翻译出版的《资本论》——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将《资本论》

全译出版。

第一次传播国际歌——1920年10月——12月，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劳动者》第三、四、五、六期，连载了《劳动歌》，这是《国际歌》最早的中译文。

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1919年“六三”工人大罢工。

为帮助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使者——魏金斯基。他1920年4月来到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它成立于1920年5月。

党中央第一个理论刊物——《新青年》。《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党的一大确定为党中央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李汉俊、陈望道担任主编。

党中央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它创刊于1922年9月13日，创办者是蔡和森同志。

我党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于1925年6月4日发刊于上海，主编是瞿秋白同志。

我党第一个出版社——“新青年社”，1920年9月创办。

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1920年11月成立。

我党第一个党校——中共安源党校1923年创办。

第一次出现中国共产党名称的是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

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是1943年7月8日，王稼祥为纪念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

第一次纪念党的生日——1936年陈潭秋、米夫（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七月号上发表了两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纪念党的生日，是1938年，党中央发了纪念党的生日和抗战周年的指示。1941年，党中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的指示》中，首次明确党的生日是7月1日。

第一个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的是陈潭秋。

第一个马列主义书籍图书馆是“亢慕义斋”。

第一次出现“解放军”这个称呼，是在1945年8月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反攻命令中。

第一个见到列宁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张太雷。

第一个坐牢的共产党员是李森，他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三个领导核心成员之一。

第一个农会是1922年成立的广东海丰农会。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1929年10月毛泽东等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

第一个反对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是恽代英。

第一部党史是蔡和森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

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权是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国际共运史上的“第一”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1847年6月，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于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它的建立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国际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

第一次广泛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836年至1848年，英国爆发的以工人为主体的，为争取政治权利进行的宪章运动。运动虽然失败，但它推动了欧洲工人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已经独立登上世界舞台。

世界上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1848年5月31日，由马克思主编出版的《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该报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共出版三百零一期。恩格斯称它是在德国、在全欧洲高高举起无产阶级旗帜的唯一报纸。

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这部著作主要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领导人鲍威尔的唯心历史观。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1871年8月18日法国工人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后，于28日宣告成立的巴黎公社。公社虽然只存在了七十二天，但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

关于党的“一大”和党的生日

每年7月1日，我们都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辰。不少人习惯于把7月1日当作党的“一大”开幕的日期，其实，7月1日并不是“一大”召开的日期。至于“一大”究竟什么时候召开的，至今尚无定论。

建党初期，党的活动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组织程序也较为简单，所留下的文字记载很少，给确定“一大”的日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党史研究工作者根据尚存的当时文字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从几方面作初步的考证，认为“一大”的开幕时间是7月23日，闭幕是7月31日。

至于纪念党的生日，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早在1938年就有地区性的活动。而在全党范围大规模纪念“七一”，则在1941年——党成立20周年以后。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外有日寇侵略，内有反对派封锁，没有条件弄清“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因此，党中央确定把召开“一大”的1921年7月份的月首，即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从此，纪念“七一”成了我们党的例行活动。“七一”这个一年一度的庄严的纪念日，在国内外、党内外已

有深远影响。我们认为：研究党的“一大”召开日期，与继续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不矛盾的。

中国共产党命名经过

在党史著述和报刊宣传中，多认为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叫“共产党”，其实刚成立时叫“社会党”，随后才改称“共产党”。

1920年8月，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后，9月1日出版发行的这一期《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文中用的名称是“吾党”、“社会党”。

据张申府于1983年3月说：“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大约是1920年8月上、中旬正式成立的”。成立时叫的是“社会党”，1920年8月中旬，李大钊和我接到陈独秀的信，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我商量。李大钊告诉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称共产党，并叫我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信大约是八月下旬从北京发出的。后来和陈独秀又谈到党的名称，他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照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

党史之最

1. 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李大钊。他在1918至1919年先后发表了《法俄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2. 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是《新青年》。它于1915年9月创刊，1920年9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3. 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由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组成，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4. 中国共产主义者最早出版的党内刊物，是1920年11月7日创办的《共产党》月刊，主编是李达。

5.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先在上海、最后一天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6. 中共中央最早的机关报是蔡和森主编的《向导》，1922年9月13日创办于上海。

7. 党领导的第一张日报，是1925年6月由瞿秋白在上海主办的《热血

日报》。

8. 中国最早译配《国际歌》词曲的是瞿秋白，刊载在 1922 年 6 月 15 日出版的《新青年》上。

9. 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是 1921 年 8 月在上海建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0. 中国产业工人中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于 1922 年 2 月在江西安源路矿建立，李立三任书记。

11. 党领导的第一个农会，是 1922 年成立的广东海丰县赤山约农会。

12. 中国农村最早的共产党支部，是 1923 年 3 月在广东省顺德县建立的中共顺德支部。

13. 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是 1924 年 7 月彭湃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14. 我党最早的党校是 1925 年 9 月由李大钊等创办的北京党校，罗亦农任校长。

15. 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等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

16. 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是 1925 年 11 月在两广区委领导下建立的独立团，叫挺任团长。

17. 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 1927 年的“八一”南昌起义。

18.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开始于 1923 年。这年 6 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随后即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 最早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是王稼祥。他在 1943 年 7 月 8 日为纪念党成立 22 周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有十来处提到了毛泽东思想。

遵义会议情况是谁向共产国际报告的

1935 年 1 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改变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分，取消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在共产国际绝对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确是一件大事。是谁最先把遵义会议情况向共产国际报告的呢？过去不少文章和回忆录几乎都说是陈云同志去报告的。遵义会议后不久，陈云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离开长征队伍，到过莫斯科，可是并未担负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情况的任务。根据最近查阅的一些有关资料，可以肯定，关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所取得的成果，首先是由王稼祥同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汇报。王稼祥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时股部受伤，伤口未愈就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其伤口更加恶化，党中央即派人护送他经上海去莫斯科治疗。根据当时的交通情况，

王稼祥同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理应在他治疗伤口期间。

十九个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深入敌后，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我军建立了一块又一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敌后根据地计有华北地区 6 个，华中地区 10 个，华南地区 2 个，连同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共计 19 个，遍及 19 个省份，人口近 1 亿 6 千万。华北的 6 个根据地是晋察冀区、冀热辽区（这两区又合称晋察冀边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这两区又合称晋冀鲁豫边区）、山东区、晋绥边区；华中的 10 个根据地是苏北区、淮北区、鄂豫皖区、苏中区、淮南区、皖中区（亦称皖江区）、浙东区、苏南区（亦称苏浙区）、湘鄂赣区和河南区（亦称豫西区）；华南的 2 个根据地是东江抗日根据地和琼崖抗日根据地。

《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经历

1920 年初，陈望道根据《星期评论》编辑部提供的日文本《共产党宣言》与陈独秀取自北大图书馆的英文本相互对照，开始了翻译工作。陈望道因受反动当局迫害而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秘密进行翻译。5 月，他带着译稿到了上海，和陈独秀、李汉俊等一起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活动，并计划把《共产党宣言》译稿交付出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了“又新印刷所”，于 8 月间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一版印一千份，很快销售一空。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发现这个珍贵的版本。1975 年，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老农刘世厚向县博物馆捐献了一本 1920 年 8 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党宣言》，最初是在济南共产主义者中间流传的。在此书首页右下角，盖有一方铭文为“葆臣”的朱印。经调查，“葆臣”是济南早期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张葆臣。这本书又辗转到早期女党员刘雨辉手中。1926 年春节，刘雨辉回故乡广饶县刘集村时，把这本《共产党宣言》给了刘集村党支部。

在大革命时期，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在晚上召集党员们学习这本《共产党宣言》。

大革命失败后，刘良才把《共产党宣言》包裹好，密藏在家里。1931 年 2 月，他离开刘集村时，把书郑重地交给刘集村党支部委员刘考文。1932 年 8 月，广饶县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刘考文估计到自己可能被捕，就把这本书转交给农民刘世厚保存。不久，刘考文等一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刘世厚把

这本书精心收藏了起来。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而这本《共产党宣言》在刘世厚的保护下却安然无恙。1975年秋，广饶县文物保管委员会到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84岁的刘世厚老人把自己保存了40多年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捐献给了国家。

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0年筹备建党时，曾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对这个宣言，现在还没查清当时是哪些人起草的。此文件，在国内没有保存，后来从前苏联保存的共产国际档案内中国党的档案中找到了。

1958年，毛泽东对新找到的历史文件，作了这样一段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国际歌》引起的一场官司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革命导师列宁曾给予高度的评价。然而，就在本世纪的20年代初，这首著名的《国际歌》在它诞生地法国，却引起了一场官司。

1920年底，《国际歌》的作者比尔·狄盖特退出了已经蜕化变质的第二国际，参加了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所属法国支部。翌年初，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宣布《国际歌》为该党党歌，而比尔的弟弟阿多尔夫·狄盖特所在的第二国际法国右翼社会党钻了曲谱正式出版时没有署真名的空子，硬说《国际歌》的曲谱所有权为该党所有。加上当时里尔市（作曲家兄弟俩居住地）的市长德罗里也是右翼社会党人，他利用市长的职权，胁迫阿多尔夫·狄盖特冒认是《国际歌》的作曲者，并强迫他在伪造的证件上签字。比尔·狄盖特为揭露这种卑劣行径，维护曲谱的著作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官司最后打到了巴黎最高上诉法院，其时阿多尔夫·狄盖特已去世，1922年9月23日，法院根据阿多尔夫·狄盖特说明受骗经过的遗书，才宣判承认比尔·狄盖特为《国际歌》的真正作曲者。至此，一场历时一年多的官司才结束。

十三大在党史上的五个第一

1. 第一次全面深刻地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解决了党长期以来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

2. 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以无产阶级的伟大胸怀，带着退出中央委员会，以加快党的干部年轻化的步伐。

3. 这次大会，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采取了差额预选，预选出候选人后，再实行等额选举。

4. 采访十三大的 400 多名中外记者，不但采访了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大会新闻发言人还安排了 5 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5. 这次大会所体现的改革精神，如修改党章，历届大会都是中央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然后通过一个新的党章，这次大会只通过了一个关于党章部分条文的修正案，没有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另外，中顾委、中纪委的工作报告只提出了书面报告。这更有利于大会集中精力审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制订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

新中国的国名是怎样确定的

新中国建立前，党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写文章、演讲，大多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称谓将要建立的新国家。1949 年 6 月，全国政协筹备会召开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在以董必武为组长的第四小组工作，并代理副组长。该组负责拟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讨论起草过程中涉及到新中国的名称问题，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先生提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意见博得该组代表们的同意。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期间，董必武就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称作了说明：“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4 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张奚若先生为新中国取的这个妥贴而响亮的名称被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接受，并写入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由于新中国国名有这样一个确定经过，不少人认为此名称是张奚若先生首次提出的。其实最先明确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却是任弼时同志。早在 1948 年 1 月 12 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说：“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予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在谈到 1947 年冬伟大的学生运动时他又说：蒋介石统治区以学生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生“看到了革命的发展，天下将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建立……”

任弼时的讲话，无论从内容和时间上，都可以说是最早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的。

新中国国旗的诞生

1949年4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并一举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挂在伪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坠落在地，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在北京成立，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新中国做各项准备工作。筹备会下设工作小组的第六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等方案。组长是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副组长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后又增加沈雁冰任副组长。成员有张澜、郭沫若等16人。7月初由叶剑英主持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决定以新政协筹备会名义向全国发起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随后又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为国旗、国徽图案评审委员会顾问。

征集启事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登载后，立即得到全国人民和国外侨胞的热烈响应，不断接到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来稿和图案。其中应征的国旗图案最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收到2992幅，里边还包括从遥远的美洲寄来的23幅。

8月中旬，政协筹备会在北京饭店设立了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的设计稿集中排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评委会从来稿中精选出38种国旗草图，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

9月，政协一届会议各组几经讨论，多数人认为五星方案美丽大方，寓意也好。有人赞赏黄条方案，即旗的左上方一颗大星，象征党的领导，下面一条黄杠，横贯旗面，代表黄河；有划两条三条黄杠的，代表黄河、长江以及珠江，都是象征中国文化发源地的。会间一次晚宴上，毛泽东和张治中颇有兴致地谈及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张治中坦率地谈了看法：“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底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子，象孙猴子的金箍棒。”

过了两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召集了国旗、国徽等方案协商座谈会。在研究国旗图案时，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特色，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特征。代表国家特征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他拿着五星红旗图案征求大家意见。有人提出疑问说：“这4个小星星代表工、农、小资产、民族资产4个阶级，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就没有后面两个阶级了，国旗不是又要改吗？”毛主席敏捷地说：“中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

小星代表 1 个阶级，就是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这样一说大家很高兴地报以热烈掌声。

9 月 26 日，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通过了第 323 号设计图案（即五星图案）为当选图案。在这之前的原设计图案上，大星中还有镰刀斧头，审查组认为一颗大星就代表了党的领导，大星中不必再出现镰刀斧头，故作局部修改，取消了镰刀斧头，并对国旗图案的意义作了统一说明。27 日，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提出国旗等 4 个决议草案。关于国旗决议草案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决议。

这个被采纳的五星红旗方案的设计者，既不是名家巨擘，也不是美术大师，原来是上海的一位计划财务工作者，名字叫曾联松。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满怀爱国激情，曾不止一次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他少年时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的惨状，便立志走科学救国之路，去攻读理工，后又改读经济。上海解放不久，32 岁的曾联松从报纸上看到征求国旗图案的启事，便决心在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工作上做出贡献。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苦苦思索，精心构图，反复修改。他从群星闪烁的天空，联想到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设想以一颗大五角星引导于前，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几颗小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象众星拱北斗，紧紧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在数量上，他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确定以 4 颗小星代表广大人民。为了使大星喻指党的领导能表现得更为明确，他在大星上又加了镰刀斧头。在设色上，整个旗面为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五角星用黄色，不仅与红色相协调，而且显得金光灿灿，色简而庄严，也体现出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在构图布局上，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当中，小星环绕在旗面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天地不够广阔，且显呆滞。他反反复复地勾划。一次，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金星居高临下，仿佛看到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一片光明，便确定下来。在五颗金星的结合上，大小呼应，疏密相同，形成一个椭圆形。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然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结论显示在旗上。他熬过许多不眠之夜，终于完成了设计图稿。1948 年 8 月中旬曾联松将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他精心设计的国旗方案被选中了，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的事情。

自从国旗图案被通过那天起，首都人民就掀起了赶制五星红旗的热潮。在突击赶制的无数面五星红旗中，有一面特制的大旗，它长 4600 厘米，宽 3380 厘米，用红色绸料作旗面，鲜红耀眼；用黄色缎料作五颗星，金光灿灿。这就是毛主席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

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

1949年7月，《人民日报》等报刊登载征求国徽的启事后，共收到国徽稿件122件、图案900幅。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和专家们审阅后，认为绝大部分不能采用。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分组讨论，大家也对国徽图案不满意。鉴此情况，毛泽东在专门协商讨论的座谈会上提出，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工作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不久，全国政协会议决定要求清华大学营造系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组织力量进行国徽方案的设计竞赛。

1950年6月20日，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营造系主任梁思成教授等9人设计出的金红两色、以国旗、天安门、齿轮、麦穗、稻穗、红绶带为内容的国徽图案，经过国徽审查组集体讨论通过。6月21日，审查组的马叙伦、沈雁冰向政协一届全委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审查报告。23日，大会通过了国徽方案，并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关于国徽图案的建议。

1950年7月，梁思成把国徽图案交由清华设计组高庄教授制作模型。高庄曾创作了《鲁迅》、《朱总司令》、《毛泽东》等木刻、浮雕石膏像。这次他参考我国秦汉铜镜和北魏石刻佛像，采用了45度锐角线平面立体浅浮雕技法，发扬了我国雕塑艺术淳厚质朴、深沉雄大的民族形式，使国徽题材内容组成一个有生命的整体。

1950年8月18日，国徽模型经审查一致通过。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并在《人民日报》公布了国徽图案及图案说明、使用办法、制作说明。我国庄严而美丽的国徽诞生了。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用国旗上的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齿轮和谷穗象征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新中国成立时盛典集会的场所，它是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整个国徽图案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的性质，标志着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制定，同时也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夙愿。

1942年冬天，董必武同志要从重庆返回延安，宋庆龄在她的寓所举行欢送茶会。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应邀出席。桌上摆着两串颗粒饱满的麦穗，被炉火照得金光闪闪。这些麦穗是重庆附近的农民送来的。看着这些麦穗，席上

有人赞美说：“真象金子一般。”宋庆龄充满激情地说：“它比金子还宝贵，中国人口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周恩来也抚摸着麦穗，意味深长地说：“等全国解放，我们要把麦穗画到国徽上。”全国解放后，在制定国徽图案时，周总理果然郑重地建议要把麦穗画上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它产生于30年代。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迅即侵占我东北三省，又把侵略魔爪伸进华北。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东北人民奋起组成义勇军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战斗。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为了宣传和推进抗日救亡运动，我党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之一、著名戏剧家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他很快拟出电影文学故事梗概，为影片主人公创作了长诗《万里长城》，这诗的最后一节就是后来成为影片主题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在这时，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夏衍接手完成《风云儿女》的台本。

我国著名作曲家、由田汉发展入党的中共党员聂耳，当时也接到反动派要迫害他的警告，党组织决定让他出国暂避。聂耳主动找到夏衍，要求承担影片主题歌的谱曲任务。夏衍十分信任地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交给了他。聂耳抓紧离国前的短促时间谱出了初稿，到日本后又寄回了经过修改的定稿歌谱。

1935年5月出版的《电通画报》，首先刊载了《义勇军进行曲》，接着又灌制唱片。同年7月，《风云儿女》上映，上海到处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随着“一二·九”运动，它又传遍了全国。1940年以后，这支歌经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歌唱和灌制唱片，在全世界传播，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

《义勇军进行曲》曲调高昂激越，气势磅礴，显示了祖国的尊严，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恨和坚决反抗的精神。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新政协筹备会征集国旗、国徽和国歌的启事。为选出“人人会唱”又“人人爱唱”的国歌，由田汉、沈雁冰、欧阳予倩等组成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另聘马思聪、吕驥、贺绿汀等为顾问。筹备会收到的国歌应征稿比较多，但大家都感到不够理想，并认为在短时间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困难的。9月，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各小组代表在讨论国歌问题时，意见很不一致。

9月25日，毛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邀请一些人开了国旗、国徽、

国歌的协商座谈会。会上徐悲鸿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建议，得到了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等人的支持。有些人对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异议，认为现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已被赶出大陆，中国从此进入太平盛世，又何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主张改掉这一句。也有的人提议只用曲谱，另行配词。郭沫若还拟就三段新词。然而张奚若坚持认为原歌词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并举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主张没有必要改词。周恩来发言，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并预言新中国成立以后，还会有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内反动派还会兴风作浪，倒不如留下这句话，可以提醒我们保持警惕，防止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他高瞻远瞩的分析，大家纷纷表示赞成。最后毛主席归纳说，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成。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做出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会议认为歌词中的某些字句虽然已不符合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但不必加以修改，以利于“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状态，发扬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于1978年3月5日通过了为《义勇军进行曲》配上新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但是一首定了型的经典性的歌曲，换了新词反而令人不习惯了。随后人们还认为修改国歌歌词的理由难以成立，呼吁恢复原国歌歌词。

4年后，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于1982年12月4日又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歌的决定。

新中国的第一颗国印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政协筹备会为准备新中国的成立，需要制作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周恩来总理委托陈叔通去上海物色治印专家制此“国印”。陈叔通找到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说明意图后，王便推荐了自己的学生顿力夫。

顿力夫原名顿立夫，因靠卖力为生，故改名力夫。民国初年，王福庵旅居京华时，雇用顿力夫为黄包车夫，兼做杂役。后随王到了上海。顿力夫跟随王福庵多年，办事勤劳，虚心好学。他在打扫书房时，总是把王福庵丢在纸篓里的印稿当作宝贝似的一一收藏起来，暗暗地悉心钻研、习刻，渐通治印。一天，顿力夫拿着一张被王福庵丢弃的印稿问王：“先生，此处甚佳，

为何再改？”王听了一惊，想不到这个车夫也懂此道。于是就当场叫他试刻一石，更使王大为惊奇，一问才知道顿力夫是在工余时间勤学苦练的。王福庵遂破格收他为徒，尽心传授技艺。顿力夫遵循良师指点更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杭州西泠印社治印名家中的佼佼者。

这次他接受镌刻国印任务，心情异常激动，这不是普通印章，而是一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印鉴。他根据陈叔通转达周恩来的具体要求，精心刻制，果然不负众望，按时圆满完成了任务。这颗印的镌刻技艺十分精湛。

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叔通把国印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仔细端详后，高兴得连声称道：“刻得好，刻得好！但不知这国印出自哪位治印名家之手？”陈叔通作了介绍，并由衷地感叹道：“一个苦力竟成为治印名家，真不容易呀！”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千千万万个苦力拓凿而成的吗？”

我国的开国大典和国庆日是怎样确定的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当天《人民日报》所发消息的标题即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

实际上，新中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政协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时在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7时半在北平开幕。”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以上文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1949年9月21日。那么10月1日的国庆日又是怎么回事呢？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国庆纪念日”的建议案，并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从此，1949年9月21日的“开国盛典”则渐渐不为人们提起，同年10月1日的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盛典则被称作“开国大典”了。

新中国原拟于 1950 年 1 月 1 日 宣告成立

1949 年 7 月，刘少奇秘密访问前苏联期间，斯大林很关心中国新政府的成立。他说，长江以南指日可下，你们迟迟不成立政府是怎么回事啊！这种无政府状态，会不会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干涉你们。刘少奇同志专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视，就把原来预计 1950 年 1 月 1 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期提前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

开国大典阅兵及国庆大阅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举行过 12 次国庆大阅兵。1949 年的开国大典，举行了第一次大阅兵。1950 年至 1959 年的国庆节又举行过 10 次大阅兵。1960 年，因我国处于困难时期，对国庆盛典进行了改革，中止了国庆节的阅兵活动。此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建国 20 周年和 30 周年，都没有举行阅兵。1984 年的建国 35 周年时，才又举行过一次国庆大阅兵。现将 12 次阅兵情况简介如下：

开国大典阅兵。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盛大的阅兵式开始。阅兵式由朱德总司令任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任总指挥。受阅部队分列式由东向西从天安门主席台前通过。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海军 2 个排，紧接着是 1 个步兵师、1 个炮兵师、1 个战车师和 1 个骑兵师。在部队行进中英雄的空军部队 14 架战斗机、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接受检阅。整个阅兵式进行了两个小时。

自 1950 年开始，每年国庆节都举行国庆盛典，并例行阅兵式，检阅中国人民武装力量。以这种方式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直延续到 1959 年的建国 10 周年，共有 10 次。各次阅兵的直接军事统帅是：

1950 年，检阅者：总司令朱德；总指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1951 年，检阅者：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

1952 年，检阅者：总司令朱德；率队入场者：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

1953 年，检阅者：总司令朱德；率队入场者：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

1954 年，检阅者：国防部长彭德怀，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上将陪同检阅。

1955年，检阅者：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同检阅。

1956年，检阅者：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同检阅。

1957年，检阅者：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同检阅。

1958年，检阅者：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同检阅。

1959年，检阅者：国防部长林彪元帅，阅兵总指挥杨勇上将陪同检阅。

1984年国庆35周年大阅兵。10月1日上午10时，国庆35周年庆典开始，由1200人组成的军乐队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鸣礼炮28响。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陪同下，检阅陆海空三军、战略导弹部队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阅兵分列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首都民兵1万余人组成。最前面的是我国最年轻的战略导弹部队方队，依次是有光荣战史的炮兵部队方队，英雄的空降兵方队，军事学院方队，女卫生兵方队，海军导弹方队，装甲兵方队，武警方队，火箭炮方队，后面是飒爽英姿的首都女民兵方队。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英雄的人民空军空中编队，凌空而过。阅兵式进行了两个小时。

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队之秘

1949年10月1日下午4时35分开始，受检阅的飞行队17架飞机，成6个分队，以整齐的队形，陆续飞过天安门广场。广场上30万群众挥舞手帕、帽子，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使广场上形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飞行队是1949年8月15日才正式成立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多数是东北老航校等处国民党空军起义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飞机都是从国民党空军手中缴获并经过七拼八凑修复的旧飞机，一部分是起义过来的。就是这支飞行队，也是我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部队。

10月1日下午4时，以9架P—51和蚊式飞机为主体的、包括教练机、运输机在内的17架飞机，从南苑机场相继升空，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4时35分，地面受阅部队仍在继续浩荡向前通过天安门，空中分列式开始。当P—51战斗机——第一、二、三分队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时，就接到地面指挥员命令：按预定计划，P—51机群再通过天安门上空一次。于是他们立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方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六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由于衔接得自然，地面观看的群众以为受阅飞机是26架。之所以使17架飞机变成26架，是因为当时飞机太少，

为解决群众还未尽饱眼福飞行队就飞完了的缺陷而采取的一个大胆措施。尽管这使受阅飞行增加了难度，但在飞行队的精心筹划安排下，达到了预想的效果。连外国记者当时的报道都写道：中共空军以野马式 P—51 战斗机为主，共 26 架飞机接受检阅。

还有一个当时局外人都不知道的秘密是，为了防备在空中受阅时敌机前来偷袭，有 4 架飞机被批准带着枪弹参加受阅飞行，飞行员又是起义人员，这是党和人民的最大信任，在世界受阅飞行史上也是创纪录的。因为世界各国为了保证检阅者的安全，从来都不允许受阅飞机带弹通过检阅台。

开国大典的礼乐之神

按照开国大典程序规定，领袖们差几级台阶登上城楼百件军乐要齐奏《东方红》。可天安门城楼高 30 多米，楼下的军乐队看不见上楼的情况，于是一人在上面手执一方红绸子，看毛泽东一步步拾级而上，差几级台阶时，他朝乐队指挥罗浪用力甩了两下红绸子。罗浪会意，指挥棒一挥，顿时颂歌高奏。

开国大典中军乐队用什么曲子，早在 9 月中旬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武主持阅兵训练会议时，就有人提出：世界上阅兵曲主要是德国式或日本式。袁世凯在小站举行阅兵时用的就是德国曲子。还有人提议用前苏联曲子。可罗浪不赞成用外国曲子。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自己的军乐曲。石家庄步校校长肖克曾主持过一次阅兵，用的歌曲包括八路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罗浪熬了一夜，把这几首进行曲串成一个彩色的圆环，并搞出一份阅兵曲目，有东方红，有军歌联奏，交杨成武上报中央军委。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庆，当然要用自己的曲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用一分钟时间碰了一下头，就作了批复。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给罗浪去电话，传达了毛泽东在曲目报告上的指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

新中国的国歌选定也是挺曲折的。眼看第一届政协开幕在即，而国歌仍没有着落。数以千计的应征稿或多或少地不尽如人意。著名画家徐悲鸿对毛主席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意不错，我看行。”毛泽东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微笑着点了头。

洪亮有力的军乐声始终伴随着开国大典的每一项议程。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军乐会是什么情景？军乐队作为特殊的队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礼乐之神。

开国大典的礼炮

毛泽东说：“开国大典的礼炮要放 28 响。”他是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也不管国外最高的礼炮是 21 响。政协会上有人提出质疑，他叫大会筹委会起草个说明。理由是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刚满 28 岁，28 响礼炮就是 28 年党史

的赞礼。

开国大典的礼炮共由 108 门山炮组成，分为两组，所以习惯上说 54 门礼炮。据说这是代表了政府 54 个单位。54 尊大炮同时发出 28 响礼炮，象征全国人民坚如钢铁的团结力量。

炮弹都是真弹卸去了弹头，只响不炸。28 发无头炮弹要在两分半钟响完，要求 54 位装填手在同一秒把炮弹塞进炮膛，54 位拉火手更要同时拉火，使炮弹同时炸响。那时放礼炮没有电操纵拉火，靠人工达到和谐统一，完全是刻苦训练出来的。

开国大典升旗秘闻

“请毛主席升旗。”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录音带上，传出 40 年前林伯渠主持大会的声音，但林秘书长这句话不准备确。在身边工作人员提醒下，他又大声宣布了一次：“请毛主席升国旗。”紧接着，话筒里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的机关在哪里？”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自言自语会通过转播台扩散到空中，从全中国每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钻出来。这也难怪，他们在山沟里一蹲多少年，第一次在大城市举行庆典没有经验。

用电钮升旗的点子，是大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唐永健想出来的。开国大典的前一天夜里，工作人员预演升旗，国旗慢慢地走到中途停住不动了，好象挺悲痛似地成了半旗。有人对此做了一个风趣而又切合当时情景的注解：几个小时前，国旗的正南方，毛泽东主席铲下了第一锹土，为人们英雄纪念碑奠基；这面有灵气的国旗在它第一次升起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 820 万英灵，自动升在半旗位置上向烈士致哀。

翌日下午，国旗顺利地到达 22 米高的白色铁杆顶端。

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装饰设计

每当人们经过节日的天安门城楼时，总会对城楼上那 8 个火红的宫灯和 8 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以及城墙上的毛主席像和像两旁的横标肃然起敬。而这一切最初的设计者竟是两个日本人——小野和森茂。

1945 年秋的一天，一群日本青年从北平逃出，来到已经解放了的张家口。他们之中就有小野、森茂。晋察冀军区的领导很快批准了他们参加八路军的要求，并让他俩到“抗敌剧社”（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前身）负责舞台美术工作。此后，他们为“抗敌剧社”设计了许多优秀的舞台美术、布景。

1949 年 9 月，党中央把举行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最后下达给以小野、森茂为主要创作力量的军区文工团舞美队。

旧时的天安门，是古老的封建的象征，城楼上阴森森的。怎样才能使天

安门焕然一新地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为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增光添彩？小野和森茂满怀激情地画了几十张草图，最后把最满意的一份交上去，转呈周总理审批。很决，草图被批准了。然而要实现方案又是何等不易。仅仅那 8 个宫灯，每个足有 10 立方米大，跑遍北京城也找不到。只好请来过去为宫廷做宫灯的老艺人，在小野、森茂的具体指导下现场赶制。开国大典那天凌晨，敬爱的周总理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作最后的检查和验收。

几十年过去了，天安门城楼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年的设计风格。

国务院为什么没有办公大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务院（1954 年前称政务院）就在中南海办公，都是老式旧平房。国务院会议厅是幢老式旧平房，光线阴暗，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

50 年代中期，同志们就建议改建扩大，但周恩来不同意，后来，有人又建议盖一座政府大楼，把会议厅和办公室一起解决。周恩来坚决不赞成。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府大楼。”

在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过程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又提出了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周恩来看到方案以后，又专门听了国务院主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的汇报。周恩来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对此事，周恩来还征求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马上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

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字是怎样刻上去的

当你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天安门广场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可曾想过：当年毛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字，是怎么放大到那高大的碑体上，又是怎么刻到那坚硬的花岗岩上的？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的，便是已故著名书法篆刻家魏长青。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魏长青被邀参加建碑工程。毛主席的题字，原写在信纸上，每个字只有两寸左右见方。要把这些字刻到碑心石上，首先要放大 20 倍，其中一个“永”字就高两米多。当时用幻灯投影放大，按着光影把字描下来。可是这样描出的字却失掉了原手写体的神韵，需要把放大后的字进行加工整修。几个人试过了，都不能令人满意。魏长青被推荐出来。他仔细分析毛主席手写体字的特点，然后精心描摹，细致加工。把加工好的字再照相缩小 20 倍与原手写体相对

照，惟妙惟肖不差毫厘。

把放大的字往石碑上刻，碑心石是块花岗岩，又硬又脆，一凿就崩，魏长青建议：把胶皮覆盖在碑体上，将需要篆刻部位的胶皮挖下来，形成“阴文”轮廓，然后用高压喷射矿砂往花岗岩上“打”。就这样，“打”出了一个个边缘整齐的大字。

国体

世界国歌杂谈

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歌曲，通常在隆重集会，仪式等场合演奏（唱）。国歌之于国家的庄严性并不亚于国徽、国旗。

世界上最先制定国歌的国家是何兰，在 16 世纪，西班牙侵略者占领荷兰后，荷兰人民为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压迫，唱出了激昂慷慨的战斗进行曲，这就是《威廉·凡·那骚》，政府就把这首歌定为国歌，那是 1568 年。距今已月 400 多年的历史。荷兰国歌面世后，世界许多国家便以此为便，相继制定自己的国歌了。

世界上最著名的国歌是法国的《马赛曲》，初名《莱茵河军队战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风行一时。这首歌作于 1792 年奥、普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危急时刻，作者工兵大尉鲁日·德·李尔只用了一人夜晚写成。它威武雄壮，表达了法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暴政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当时马赛市一个志愿军团为保卫革命政府和国民议会，在进军巴黎的征途上，士兵们就高唱着它前进，《马赛曲》之名由此而来。1792 年 12 月，《马赛曲》被革命政府宣布为“共和国之歌”，到 1795 年，被国会正式通过定为国歌。

世界上不少国家没有制定出正式国歌之前，往往把一首合乎国情民意的歌曲定为代国歌。前苏联建国之初，曾以《国际歌》为代国歌，直到斯大林领导时期才正式诞生了国歌。

国歌一般都短小精练。科威特国歌演奏一遍只有 14 秒钟，在礼仪场合上往往需要反复演奏多次，是世界上最短的国歌。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国歌是智利国歌，但全部演奏时间也只有 3 分钟。

对国歌的最长和最短还有一种说法是，巴林国歌没有歌词，其曲谱仅有 7 小节，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短的国歌；希腊国歌的歌词系诗人狄奥尼西奥斯·索洛莫斯所作，歌词长达 158 段，被称为全世界最长的国歌。

标题最长的国歌当属沙特阿拉伯的国歌，国歌乐谱出版时的标题是：《以大慈大悲的上帝的名义，为受到赤胆忠心地为之献身的人民所拥戴的皇帝陛下所作的颂歌》。

各国的国歌大都是由其著名的作曲家、诗人参加创作。世界著名作家海顿，就曾为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创作过国歌。

世界上的国歌四拍子居多，节奏上有一种庄严的效果。而奥地利、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国歌是用三拍子节奏的，又给人一种轻松、欢快的感觉。

少数国家在国歌之外，还有准国歌，这主要是在一些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规定，凡是仪式属于英联邦范畴的，即以《天佑女王》作为国歌；如

果仪式与英联邦无关，则以《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作为国歌，后者就叫准国歌。

瑞士是由4个语言不同的民族组成的联邦，故在国歌确定上一直争执不休。一个时期他们把《召唤吧！祖国》、《啊！我们的祖国》和《瑞士诗篇》都作为国歌来唱。后在军队里举行仪式或在外交场合，都采用《瑞士诗篇》。但仍有反对意见。

大多数新国歌都设法避免了对个人的赞颂。但个别的如加纳国歌唱的是对恩克鲁玛的赞辞，突尼斯国歌赞颂“我们伟大的领袖哈比卜的精神”（哈比卜为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名字），是属于颂扬个人的。

各国国歌名称集锦

朝鲜《爱国歌》	丹麦《基里斯兰挺立桅杆旁》和《有一处好地方》
日本《君之代》	土耳其《独立进行曲》和《德意志之歌》
孟加拉国《金色的方》	法国《马赛曲》
新加坡《前进吧！加坡》	新芬兰《祖国》
印度《人民的意志》	荷兰《威廉·凡·那骚》和《谁脉中流着荷兰血》
阿尔及利亚《誓言》	前南斯拉夫《嗨！斯拉夫人》
奥地利《让我们拉起前南斯拉夫手来》	挪威《对！我们热爱祖国》
比利时《布拉班人之挪威歌》	瑞典《你古老的光荣的北国山乡》
波兰《波兰没有灭瑞典亡》	澳大利亚《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澳大利曲》亚向前进）
瑞士《瑞士诗篇》	英国《上帝保佑国王》（《天佑我王》、《天佑女王》）
西班牙《皇家进行曲》	保加利亚《亲爱的父母邦》
希腊《自由颂》	罗马尼亚《三色旗》
匈牙利《艾克尔》	扎伊尔《扎伊尔人》
意大利《马梅利之歌》	冰岛《千年颂》
阿根廷《祖国进行母邦》	阿尔巴尼亚《国旗颂》
美国《星条旗》、《哥伦比亚颂》、《美丽的亚美利加》	
加拿大《啊，加拿大》	

经联合国国歌

《联合国歌》诞生于1945年，是美国诗人H·J·罗梅根据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歌曲《相逢之歌》的曲调，重新填词而成的。

《相逢之歌》是肖斯塔科维奇在1932年为前苏联故事影片《相逢》写的主题曲，由高尔尼洛夫作词。罗梅依照《联合国宪章》精神，按这首歌的曲词填了新词，作为《联合国歌》。它的歌词是：

太阳与星辰罗列天空，大地涌起雄壮歌声。人类同歌唱崇高希望，赞美新世界的诞生。

奋起解除我国家束缚，在黑暗势力压迫下，人民怒吼声发如雷鸣，如光阴流水般无情。

太阳必然迎着清晨，江河自然流入海洋。人类新世纪已经来临，我子孙多自由光荣。

联合国团结向前，义旗招展，为胜利自由新世界携手并肩，为胜利自由新世界携手并肩。

亚洲国歌种种

国歌由国家确认和制定。亚洲各国都有国歌。

国歌选用进行曲和民歌的国家。中国：义勇军进行曲；不丹：皇家颂歌；菲律宾：菲律宾民族进行曲；柬埔寨：4月14日伟大的胜利；马来西亚：我的祖国；斯里兰卡：顶礼，顶礼母亲；越南：进军歌。此外还有朝鲜、孟加拉、日本、土耳其、以色列和印度等国。如土耳其采用的独立进行曲，歌词是：“别害怕别心灰，红旗的颜色不会褪。这是为祖国燃烧的最后的炉火，我们知道它不会灭，这是我们祖国的明星，它将永远光芒四射”。又如文莱苏丹国国歌是祝愿似的，歌词是：“上帝保佑文莱，苏凡陛下万岁，依仗着公道和权威，领导人民把国家保卫，祝愿祖国繁荣，苏丹安泰，至高无上的神保佑文莱苏丹国”。

只有歌曲，没有歌词的国家。阿联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巴林、卡塔尔，科威特、蒙古、塞浦路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歌曲的音调的节拍。1=A3/4有孟加拉。4/4有马来西亚、蒙古、叙利亚、土耳其。

1=B2/4有巴基斯坦。4/4有阿曼、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朝鲜、越南。

1=C2/4有科威特、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4/4有日本、伊拉克、印度。

1=G2/2有不丹。2/4有中国。4/4有菲律宾、黎巴嫩、尼泊尔、印尼、以色列。

1=E2/4有卡塔尔。4/4有斯里兰卡。

1=F2/2缅甸。2/4有老挝。3/4有塞浦路斯。4/4有约旦、沙特、泰国、文莱、新加坡、阿联酋。

1=D4/4有巴林、马尔代夫。

歌曲歌词创作悠久的国家。日本国歌的乐谱创作于1870年，泰国歌曲是1872年为国王拉玛王储（朱拉隆空）创作，歌词是1913年改作，1934年定为国歌。以色列国歌《希望》原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颂歌，1897年唱起。菲律宾国歌作于1898年菲独立时，乐谱发表于1899年9月3日的《独立报》上。

一人为两国创作国歌。印度诗人泰戈尔，他的诗，《人民的意志》、《金色的孟加拉》分别为印度和孟加拉国国歌的歌词。

两国同样的国歌。亚洲的伊拉克和非洲的埃及国歌相同，它始于 1960 年 5 月 20 日，源出于 1956 年反抗英、法和以色列入侵，在战斗中广泛流传的一首战歌。歌词为埃及新闻记者沙欣创作，其友河塔维尔谱曲。歌词是：在战斗中，我的武器，我多么想把你握紧，请对我说：‘我很机警，你躲在哪儿战争’，勇敢的军队冲上前，发出雷霆般的呐喊，不取得时代的胜利，发誓决不生还。”

一个国家两个国歌

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有趣的是，有的国家同时具有两首国歌。比如丹麦王国，以《基里斯高挺立在桅杆旁》和《有一处好地方》两首歌曲为国歌。瑞士则把《祖国，请你召唤》和《瑞士诗篇》同时作为国歌。在荷兰，《威廉·凡·那叟》和《谁脉中流着荷兰血》分享国歌的荣誉。澳大利亚为在两首歌曲中选定一首为国歌，曾举行民意测验，但因意见不一致最后也没定下来。

二十多国共用的国歌

1745 年 9 月 28 日，伦敦的一家大剧院首次演唱了称颂国王乔治二世的歌——《上帝保佑国王》。至 1825 年，它已经成了“国之歌”。这首名为《上帝保佑国王》的国歌，自维多利亚王朝以后，逢女性继承王位，歌词就改为《上帝保佑女王》。

至今，约有 20 多个国家把这首曲子作为本国的国歌或准国歌。列支敦士登今天还完全采用英国国歌的旋律。瑞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用这首曲子，在 1961 年才另选国歌。加拿大直到 1980 年才废止以英国国歌为国歌。象新西兰、澳大利亚这样的英联邦国家，虽然也有自己的国歌，但均以英国国歌作为本国的正式国歌。麻烦的是，这 20 多个国歌旋律相同的国家，若在奥运会上就分不清彼此了。

国旗点搞

1900 年，清朝政府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向慈禧太后上疏奏请制定国旗。并呈上画有虎、豹、狮、龙、微微、八卦等图像的国旗图案。慈禧决定用金龙旗为国旗，通称黄龙旗（龙为皇帝的象征，黄色则为满族的代表色）。黄龙旗最初为三角形，后改为长方形。这是我国的第一面国旗。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12 月 29 日，17 省代表在南京开会，

一致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一致决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共和的意思。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八”反革命政变，建立了独裁的“国民政府”，改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堑，占领南京，宣告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垮台。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着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伊朗的国旗

伊朗的全称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它位于西亚的伊朗高原、伊朗古称波斯，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创造了灿烂的波斯文化，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横跨它的北部。

1980年7月，伊朗采用了新国旗。这面国旗由绿、白、红三种组成、绿色在上、红色在下，白色居中。绿色象征伊斯兰，红色表示鲜血，白色代表和平、友谊和安宁。在绿、红两色与白色交接处，各写有“安拉—阿克巴尔”，意思是“真主伟大”。“真主伟大”共有22个，是纪念人民在伊斯兰教历11月22日（1979年2月11日）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在白色的正中绘有伊朗的红色国徽。

国徽是由4弯新月、1把宝剑1册经书组成。它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4弯新月和1册经书组成阿拉伯文的真主“安拉”，表明伊斯兰教为伊朗的国教，真主“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唯一主宰。1册经书绘于图案顶端，它代表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古兰经》，是伊斯兰共和国一切行为的准绳。《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公元610—632年的23年传教过程中颁布的经文，宝剑代表“圣战”与“武力”，它与4弯新月一起还表示伊斯兰教的5大信仰：信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信天使；信《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经典；信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安拉的“前定”；信“死后复活”和“末日审判”。新月、剑和经书又交错组成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作证词：“除安拉外，别无神祇”。整个国徽图案呈圆形，代表地球。

黎巴嫩的雪松国旗

黎巴嫩共和国位于西亚西部，地中海东岸，它的原意是“白山之国”。在当地语言里，“黎巴嫩”是“白”的意思，所以黎巴嫩山脉也就是白山，黎巴嫩于1943年独立。

黎巴嫩国旗呈横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三比二，由红、白、绿、棕四种颜色构成。贯穿旗面中间部分的是白色横长方形，它占据了全部旗面的一半，

另一部分成上下两个相等的红色横长方形，与白色两边相连。高大的雪松在白色旗面的正中，显得很突出，格外引人注目。

黎巴嫩除了沿海为狭长的低地外，内地有许多同海岸平行的山地。东部的山较高，气候寒冷，山峦积雪，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乳白色，所以旗面一半为白色。黎巴嫩居民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居民中信奉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约各占一半，所以旗面上下的两条红带分别代表两大教派。又因为红色是热烈和欢乐的象征，所以旗面用特别鲜艳的红色。绿色的雪松和棕色的树干形成的塔状乔木，是黎巴嫩的象征。在古代，黎巴嫩人把雪松看作是“植物之王”，曾经引起王公贵族的疯狂追逐和掠夺，雪松和树丫层层伸展，构成塔状树冠，一年年地叠上去，垒成擎天巨伞，万劫不倒，雪中长青，代表了黎巴嫩的民族精神，因此，雪松就成了国旗和国徽的中心图案。

阿曼“T”字国旗

阿曼的全称是阿曼苏丹国，位于西亚阿拉伯半岛的东南部。“阿曼”的意思是“宁静的土地”，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阿曼似乎成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阿曼国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约为七比五。国旗由红色“T”字形图案、白色长方形和绿色长方形构成。“T”字型横梁占据旗面的左侧，它的长等于旗面的宽，约占旗面的三分之一。它的中轴横贯旗面，宽约占旗面长的五分之一。中轴上方是横着的白色长方形，下方是横着的绿色长方形。旗面的左上方镶嵌着黄色的国徽，国徽由两把带鞘战刀构成斜十字，交叉点上横贯着一副镣铐，还有一把弯折的战刀直通过交叉点。

阿曼国旗上的“T”字形图案象征着国土的轮廓。阿曼全境大部为高原，只有沿海才有狭长的平原，全国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居民从事农牧业生产，所以国旗下方用绿色象征平原和农牧业生产，阿曼绝大多数民居民为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旗上方有一块白色长方形。国旗左上方镶嵌着黄色国徽，表明阿曼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国旗的图案象征着阿曼人民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光荣历史，象征着阿曼人民对自由、幸福、民主、和平的追求。

阿曼国旗颜色鲜艳，对比强烈，充分表现了阿曼民族热烈、奋进的精神。阿曼苏丹国一贯遵循中立和不结盟的原则，主张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合作友好关系。

巴林的红白齿牙形国旗

巴林国位于西亚波斯湾的西部，是一个美丽的岛国，由 33 个大小岛屿组成。巴林在 1971 年 8 月 14 日宣布独立，并制定了富有自己国家特色的国旗。

巴林国旗呈横长方形，长宽之比为五比三。旗面由红、白两种颜色构成，白色约占旗面的五分之一。它的图案与卡塔尔国旗有些相似。八个白色的齿牙均匀地楔入红色旗面内。

巴林国旗的颜色和图案，与巴林岛的地理环境和巴林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有关。在阿拉伯语中，“巴林”是双海之意，所以国旗上只有红、白两种颜色。巴林国的居民大部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又因为巴林岛大部分由石灰岩和砂岩低丘构成，这些岩石在烈日照射下发出白光，因此国旗上有白色。独立前，巴林人民长期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经过流血斗争终于获得独立。旗面的红色正是象征鲜血换来的胜利；红色还象征了巴林人民的热情和勇敢。红白齿牙形的图案象征着巴林岛的两股泉水：一为境内的咸水，一为许多自流井和泉水。相互交错的齿牙形图案又象征着巴林人民的紧密团结。

巴林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丽的巴林国国旗从独立的那一年起，已经在巴林国内飘扬了 20 个春秋。

世界各国元首任期

任期半年的有圣马力诺，元首 2 人，称为“执政官”。并规定不得连选连任。任期一年的有瑞士联邦，元首称为“联邦主席”，任期届满，由副主席递升，同时另选一名副主席。任期四年的国家比较多，如朝鲜、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美国、菲律宾、马尔代夫、缅甸、新加坡、卢旺达、前联邦德国、葡萄牙、以及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任期五年有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均不得连任）；还有古巴、德国、保加利亚、印度、萨尔瓦多、刚果、上沃尔特、前苏联、尼日尔、象牙海岸、巴拉圭、乌拉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的“总统”与“主席”可连选连任。任期六年的有：墨西哥、黎巴嫩（以上两国规定不得连任）；阿根廷、芬兰、奥地利、埃及、巴西、斯里兰卡等国都可以连选连任。任期七年的仅有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少数几个国家，元首皆称为“总统”。任期八年的就更少了，仅有利比里亚与智利两国总统，并可连选连任。

漫话日本皇室

日本皇室就是天皇及其直系家族（皇族）的统称。天皇的男性子孙概称“亲王”，除皇太子外，结婚后一律封为“宫家”；女性子孙称作“内亲王”（侄孙子辈称为“女王”），出嫁后即自动脱离皇籍，不再算作皇室成员。

现今的日本皇室就包托 5 个宫家 21 名成员。战后，按照《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仅是“日本国之象征及日本国民整体之象征”，只能“实行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之行为，并无干预国政之权能”。而且天皇进行国事活

动必须“经内阁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皇室的所有财产也“均属于国家”，皇室的一切费用“均须列入预算，并经国会议决。”即使象皇后的册立、皇位的继承、皇族男子的婚姻等涉及天皇家庭的大事，也须遵照《皇室典范》，由内阁首相、参众两院正副议长为首的皇室会议议决。皇室每年度的经费预算也是由内阁首相主持的皇室经济会议审定。

包括天皇在内的皇室成员的年俸或公务活动经费均出自皇室经费。皇室经费包括内廷费（天皇夫妇以及皇太子一家人的生活费）、皇族费（其他 14 名皇室成员的生活费）和宫廷费（皇室进行国事活动的经费）。据 1985 年皇室经费预算，内廷费 2.57 亿日元，皇族费 2.1 亿日元，宫廷费 24.9 亿日元，总计 29.57 亿日元。

外交官员的职称

大使。为最高一级外交代表。由一国元首向另一国元首派遣，享有比其他外交代表更高的待遇。

公使。仅次于大使级的外交代表。所受待遇仅次于大使，也由元首派遣，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和大使同。

特使。为执行特定外交任务或参加典礼而临时委派的外交代表。

领事。一国根据协议派驻他国某城市或地区的代表。一般有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和领事代理人之分。

代办。低于大使、公使级的常驻外交代表。由一国外交部长派驻他国。其外交特权与豁免和大使、公使同。

参赞。使馆中仅次于使馆馆长（通常由大使担任）的高级外交官员。协助使馆馆长进行工作，当馆长因故不能视事时，通常代理馆长职务，担任临时代办。

武官。使馆组成人员之一，通常由一国的军事部门派遣军事人员担任。代表本国军事主管机关同驻在国军事主管机关进行经常和有关军事问题的谈判。

美国为什么没有外交部

1781 年，美国刚刚成立联邦政府时，是有外交部的。另外还设立了财政部、军政部，但是，国会发现，除了外交、财政和军政之外，还有许多内政事务需要处理，而他们又不想成立第四个专门机构。于是就在一七八九年将外交部改为国务院，统管内政和外交，并将国务卿列为所有阁员之首，这个规定沿袭至今未变。

1849 年，欧洲许多国家已对外交和内政职能有了明确划分，美国国务院为适应对外关系的需要，便将内政方面的职能划分出来，另成立内政部。国

务院只管外交，但名称未变，因此，美国没有外交部，而他的国务卿实际上就是外交部长。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

美国每隔四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一般称为大选。

美国的总统选举通常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之间进行，广大选民事实上不能直接参与每一过程。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是一种间接选举制度，即先由选民在本州投票选举选举人，然后由各州的选举人再投票选举总统、副总统。各州选举人的候选名单，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提出。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也是由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各自提出。

美国的总统选举，有一套极其繁琐的程序，它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预选。从2月到6月在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所在地哥伦比亚特区举行预选，选举出席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预选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基层会议”，由两党在一个州的各个选举点分别举行党的基层会议，由支持本党的选民当场表态支持谁当本党总统候选人，并选出出席县一级代表会议的代表，然后，县代表会议选出州代表会议的代表，州代表会议选出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另一种形式叫作“预选”。两党的选民在同一天到投票站秘密投票，分别支持本党某一总统竞选人，并选出州代表大会代表。

根据传统，美国总统预选一般始于新罕布什尔州，尽管从1972年起，预选阶段第一的位置被衣阿华州夺走，但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仍比衣阿华州的预选会议重要。作为直接对候选人进行投票的第一个州，全国的注意力集中于新罕布什尔州选举的结果，将其视为美国选民意向的最初检验。

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预选后，激烈的预选将一直持续到6月2日，这一天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4个州进行预选，全国各州的预选和预选会议至此告一段落。所谓“超级星期二”，是指3月10日，那天共有11个州（其中许多是南方的州）进行预选，对整个预选阶段影响较大。

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美国总统选举的第二阶段是两党分别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本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两者均可以简单多数通过。但副总统候选人须由总统候选人提出，大会同时提出党的竞选纲领。

竞选。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美国劳工节）后标志着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阶段的开始，两党确定的总统候选人将在众多的新闻记者伴随下巡回全国发表竞选演说，还要在由无党派组织安排的全国电视辩论会上，进行公开辩论，使选民们有机会比较两位总统候选人在各个政治问题上的观点，这一阶段将持续到11月。

选举日。选举日规定为大选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选举日实际上并不是选举总统而是选举选举人。各州的选举人数目与本州在国会中的议员人数相同。由于参议员每州只有两名，而众议员人数则依州人口多少而定，所

以州的人口越多，选举人票数也越多。美国 50 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选举人票往往超过 500 多张。

由于选举人事先需向选民保证其政党倾向，所以当选举人选出以后，胜负实际上已见分晓。

选举团。12 月中旬选举人分别在各州投票选举总统、副总统，并于次年 1 月 6 日开票计数。由于总统属谁在选举日已见分晓，这个程序一般只是一种例行手续。

根据美国宪法第 26 条修正案规定，凡年满 18 岁的美国公民都有选举权。

美国总统的竞选费用

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了入主白宫，不惜花费巨额资金进行竞选活动。他们所花的经费一届比一届多。1952 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时花了 600 万美元，他的对手史提文森花了 500 万美元。1984 年里根和蒙代尔分别从财政部获得竞选经费 4040 万美元，里根又在其党内领取 690 万美元。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估计，这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和参众两院的竞选开支超过 10 亿美元。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估计，这一年美国从白宫到各地县政府的竞选费用为 18 亿美元。

这些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捐献。竞选经费主要是靠财团和工会提供。各财团在每次选举中都选择它喜欢的对象，提供奖金支持这位候选人，以便日后捞到好处。如 1968 年大选时，杜邦、梅隆、洛克菲勒等 11 个大财团共捐给共和党 258 万美元，给民主党 149 万美元。还有一些高级职员也解囊相助，以便日后捞个好差使。1972 年后，美国曾规定，捐赠给竞选人的每人最多 1000 万美元，捐赠给竞选委员会的不得超过 5000 万美元，据说这是为了防止金钱对选举产生腐蚀作用，事实上并未执行这一规定。

二是募集。除了大宗的捐献外，竞选经费的另一来源是靠党组织和竞选者本人募集。肯尼迪创建每人捐款 1000 美元的总统候选人后援会，筹集了大量资金。1960 年至 1970 年，共和党在明尼苏达州搞了 3 次挨户募款活动，每次募款都达到 40 多万美元。1969 年至 1973 年间，民主党投寄了近 1000 万件关于募款的信件，收到了不少经费。

虽然如此，但入主白宫的只有一人，胜者登上宝座，有权有钱，败者则多半背上一身债。1984 年，前宇航员约翰·格伦竞选总统便欠下 283 万美元。据统计，近些年，美国有 10 位竞选失败者负债，一般要在几年后才能还清。有人在 1968 年欠的债，直到 13 年后尚未还清。加里·哈特在 1984 年参加竞选，欠债 100 多万美元。1988 年他又参加竞选，虽然他的竞选班子已募集到 100 多万美元的捐款，但美国法律规定，1988 年的竞选委员会和 1984 年的竞选委员会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捐给 1988 年的竞选经费不许用来还旧帐。于是支持哈特的民主党就开展活动，筹集资金，一部分为 1988 年竞选经费，一

部分偿还 1984 年的债务。

美国的“驴”与“象”

对于美国的总统选举，美国国内的新闻报道通常有这样两种说法：一种是“有钱人的游戏”；另一种是“驴象之争”。前一种说法好理解，后一种就有些让人费解了。要想搞清楚“驴”、“象”称谓的来历，还得从头说起。

1874 年，美国著名画家托马斯·纳斯特画了一幅政治漫画：一头毛驴和一头大象在压翘板。“驴”代表民主党，“象”代表共和党。这幅漫画的寓意是，美国政府是由这两个政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看了这幅画，不但不能为忤，相反还表示欣赏。他们解释说，毛驴性格倔犟；大象老成稳重。自那以后，“驴”、“象”就成了民主、共和两党的标志。每逢大选之年，两党支持者总喜欢举着“驴”和“象”的标志牌进行竞选宣传，一些热心人甚至把真的驴、象拉出来游街，以壮声威。

白宫巡礼

白宫有着丰富多彩的传统和精采纷呈的历史。这不仅因为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而且也是总统的办公场所。总统就在那里作为美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和军队的总司令行使宪法所规定的职责。

1792 年，华盛顿总统监督建造了这所宅第。

1814 年夏季，当英国军队放火焚烧白宫时，由于下了两个小时的暴雨才使这座建筑免遭彻底毁坏，建筑物的内部和外部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于是，詹姆斯·霍本再次被召来帮助重建白宫，花了 3 年时间，因为工程师们发现建筑物在结构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整个内部结构需要钢架取代。

1964 年，按照总统的命令，成立了白宫保护委员会来保护并说明了国家大厅博物馆的性质。

白宫的历史充满了重大事件以及总统及其一家的趣闻轶事。

东大厅。白宫里用途最广的房间是东大厅，此厅曾用作跳舞、饭后娱乐、音乐会、婚礼、葬礼、做礼拜、记者招待会，以及举行签署议案仪式的场所。

詹姆斯·霍本原打算将东大厅用作“公众接见厅”，而实际上在白宫建成之后的 29 年里。此厅尚未完工。安德鲁·杰克逊终于使东大厅全部完工，他用柠檬黄的糊墙纸、装饰性的横梁、枝形吊灯，大理石贴面的桌子，以及布鲁塞尔的地毯来布置此厅。

亚伯拉罕·林肯夫人又用巴黎式的糊墙纸和帷幔重新装饰了东大厅。然而在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队被分配到东大厅去住宿。在 19 世纪格兰特和阿瑟总统时期，东大厅进行了两次修葺。1902 年西奥多·罗斯福又整修了一次，那时候选用的金、白两种颜色的配色至今仍然独具魅力。

此厅东墙上悬挂的乔治·华盛顿的画像是白宫唯一幸存的原物。

绿厅。托马斯·杰弗逊用涂上绿色的帆布地毯铺在此厅，詹姆斯·门罗在这里使用了绿色的丝绸，绿厅因此而得名。门罗的继任者约翰·昆西·亚当斯把这间大厅命名为“绿色客厅”。

今天的绿厅反映了美利坚联邦的装饰风格，这种风格始于1800年到1815年期间。1814年大火后，原来在国宴厅里的意大利的大理石壁炉台于1902年西奥多·罗斯福革新时被搬到绿厅里来。在1971年重新布置时，又增添了绿色珊瑚饰品和几件由纽约家具师邓肯·菲弗制作的家具。

传统上被用来喝茶和会客的绿厅，也曾被那些在白宫里居住过的家庭用作各种各样的集会场所。伊迪丝·罗斯福夫人在这里举行过“妇女内阁”会议，内阁夫人和外交使团的夫人们每周一次聚集在这里刺绣、打毛线和聊天。据说这种聚会影响了为数不少的华盛顿政治家。

蓝厅。在约翰·亚当斯任期内的短暂时间里，蓝厅作为进白宫的南入口门厅。此后，蓝厅被用作接见厅。

霍本设计的蓝厅是椭圆形的，因而被命名为“椭圆形客厅”。

蓝厅曾是许多第一家庭重大事件的舞台，包括格鲁弗·克利夫兰的婚礼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孙女玛丽·琼的洗礼都在这里举行。此厅也是白宫传统置放圣诞树的地方。

红厅。红厅反映了19世纪初美利坚帝国风格的高雅和热忱。第一夫人帕蒂·尼克松选用了红丝绸贴墙，是为了使该厅同挂在室内的、由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所画的多莉·麦迪逊肖像中的椅子相衬托。

最初，这间房间叫作“总统接待室”。红厅在传统上是被用作小型聚会的客厅。里根总统和夫人曾在此厅举行过小型宴会。

红厅曾是进行秘密事件的舞台。经过一轮大的选举后，拉瑟福德·B·海斯于1877年3月3日这个星期天在这里进行秘密宣誓而入白宫。

国宴厅。国宴厅位于白宫的西边，这是一间宽敞而高雅的大厅，可以容纳140人就餐。里根总统和夫人延续了在这里招待贵宾和来访的政府首脑的传统。

1814年，英国军队焚烧了白宫之后。詹姆斯·门罗在国家宴厅安装两个壁炉。西奥多·罗斯福于1902年整修白宫时，把两个壁炉分别搬到红厅和绿厅里去，并在国宴厅的西墙上换上了一个大壁炉。那时，从十字厅西头到与之毗邻的前大厅的主楼梯被拆除了。这样一来，使国宴厅大大扩大了。

1909年，罗斯福也把水牛头雕刻在新壁炉的炉面上，在壁炉上方挂了一只麋鹿头，并在房间的墙壁上布置了一大片的狩猎战利品。

今天的国宴厅里漆上了古象牙色，窗上挂着金丝缎子帷幔。刻在新壁炉面上的是约翰·亚当斯在进入白宫的第二天所写的几句话：

“我祈祷上苍赐福于这幢房子和今后居住在这里的所有的人。惟愿诚实和智慧的人在此屋顶下永远统治。”

椭圆形办公室。白宫中最重要的房间是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在这里处理日常的例行公事，诸如：作出决定，签署决议案和行政命令，会见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

1902年西奥多·罗斯福首次将行政办公室迁至白宫新建的西翼。最早的“椭圆形公室”建于1909年，位于西翼朝南方向的中心。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占用了它。

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934年扩大白宫的西翼时，将椭圆形办公室迁到了西翼的东南角现在的地方。靠近椭圆形办公室的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会议室、新闻设施、内阁厅和罗斯福厅。

椭圆形办公室的天花板是总统印章的浮雕。在壁炉上方（壁炉的面饰同1909年在椭圆形办公室内的一样）挂着一幅乔治·华盛顿的画像。此像是查尔斯·威尔逊·波尔1776年画的。

总统的办公桌后面竖插着美国国旗和总统旗。

这张1880年由维多利亚女王赠送给拉瑟福德·B·海斯的办公桌是用女王陛下“果敢”号船上的木材制成的。这是送给海斯的友好礼品，以承认美国为营救于1855年在北极水域内失踪的“果敢”号船只所做的成功的努力。从海斯起，每届总统都使用这张办公桌，只有1963年到1977年的14年内除外，在此期间，这张办公桌在史密斯索尼亚学校展览。

白宫宴会趣事

林肯做总统时，正值内战，国库空虚。夫人玛利·多德是位爱购买衣饰、注重着装打扮的女性，往往入不敷出，欠很多债务。1862年，法国伯爵到白宫访问，国务卿要总统及夫人在白宫设宴，第一夫说，除非国家出钱，个人无力招待。但国务卿坚持要总统招待，林肯夫人拗不过他，只好把用过的家具和花园中的一堆肥料卖掉，充作招待法国伯爵的餐资。

胡佛总统和他太太在白宫3年，餐餐都是嘉宾满座，胡佛是矿冶专家，夫人是研究地质的。他俩是斯坦福大学的同窗学友。据说胡佛曾发现煤矿及金矿，因而成为巨富。他们在白宫单是饮、宴一项，已超出总统的薪津，每年均需贴上大笔自费，方能弥补，经常自掏腰包，宴请宾客。

罗斯福总统夫妇有条狗，名叫“上校”，曾受过警犬训练，请客时带在身边。有一次晚宴，请的是欧洲外交官，他们见了女士，多来吻手为礼。当一位公使弯下身来吻夫人手时，“上校”突然冲上去，将公使的裤子咬破，于是全场大哗。有人把狗制服后牵走。公使被带到另一房间，所有穿着礼服的侍者排队，然后挑一个身材和公使差不多的，交换裤子，公使这才得以继续参加晚宴。

尼克松任总统时期，宴客请柬在两周前发出，信封上有金印“白宫”字样。里面除请贴外，还有一张通行卡片，印有贵宾姓名，注明在白宫哪一个

门口入内，请柬下方，指定男宾赴会礼服式样。

到白宫大门口，将通行证给守门人看后，方可入院。到府邸大厦门前，再度出示门卡，由引路的警员带你入内，外套衣帽存入衣帽间，然后有一位穿军服、长得很帅气的侍从官，挽女宾先行，男宾跟在其后。穿过走廊，有一位白宫官员，递给客人一张卡片，上面标明你在餐厅的座位。男宾的卡片上还印有与你同席的旁边人的姓名，另一位官员则引你进入会客厅。如果总统夫妇已到，他就会把印有你名字的卡片，交给一位礼宾官员，由他唱名，再与总统夫妇握手，餐后多半有余兴节目。

国外的肃贪廉政法规

美国。1987年，美国国会通过由总统签署的《政府道德法》。它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官员必须公开公共财政收入，并提交公共财政收入报告。报告的内容要求有：认股息或债息、利息、租借和资本利润形式取得的收入；其他收入和，包括酬金；以饮食、住宿交通、娱乐形式取得的礼物；其他礼物；资产负债；涉及某种财产的交易；在任何公司、合伙商行担任的职务；与以前或将来的雇主所达成的安排或协议。另外，官员的配偶和未独立子女的财产利益也必须报告。法律规定，这种报告必须向公众公开，公众有权要求查阅。对报告的审查，主要由各部门道德监督官员进行，政府道德属的任务是进行指导，处理比较重要和敏感的案件。如果报告人有违反道德的行为，部门道德官员将对报告人提出忠告，严重得必须辞职或调职。

英国。英国肃贪主要依靠议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国家设有议会政府督察官，督察官的职责主要是受理公民通过议员向政府及政府官员提出的各种控诉，有权查阅被控告部门的文件、档案、帐簿等。

瑞典。瑞典法律规定：任何人给予或答应给予他人不适当的报酬，不论数额多少，均被认为犯有行贿罪。办案中的法官、律师、警察不能接受任何东西。为了肃贪，政府的活动几乎完全公开，官方文件除少数涉及外交，国防机密外，一律予以公开，任何公民可以到机关查阅1766以后的任何官方文件，当局还有提供复印件的义务。

日本。日本《刑法》中规定，以下受贿者均受到法律制裁。“事前受贿”：公务员在就职前预先收受贿赂，而就职后再为行贿人谋利者；“事后受贿”：公务员在职期间为行贿人谋利，而辞职后再收受贿赂者；“第三者受贿”：本人为其谋利，却叫行贿人向第三者提供贿赂者；“斡旋受贿”：让其他公务员为其办事而自己收取贿赂者。日本《国家公务员法》等法纪还规定：公务员在工作中要公私分明，不与在公务上有利害关系的人一起吃饭，不能受其馈赠；在会见外部来人或听取其陈情时，会见的地点、时间也须受到限制，公务员必须专心于本职工作，无特别准许不得兼任其他公职，即使获准兼职

一般也不得领取薪金；公务员脱离公职后，两年内不许到其离职前5年期间的工作岗位关系密切的私营企业中任职。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公务人员条例第三条规定：“公务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取得薪金以外的任何报酬均需上缴政府”；第七条规定：“禁止上级向下级借钱”。澳联邦议会为保证政府部长及两院议员为政清廉，于1984年10月9日通过决议，规定他们必须登记本人、配偶及子女的有关钱财的收益，意在反腐肃贪。

国外对公职人员廉政的监督

廉政的社会监督主要分为政党相互监督、新闻监督、上下级互相监督、公众监督等。

第一，政党相互监督。瑞典各党之间除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相互制约之外，在野党对执政党高级官员是否廉洁奉公历来予以密切关注。政府高级官员是否廉洁行为，在野党会追查，他们认为涉及到一个党的形象问题，可以影响到选民的向背。

英国在野党对以执政党为主体组织的内阁的监督非常严格。在野党除平时对执政党的监督外，每年有20天时间对执政党内外政策和实施情况提意见。通过在野党的监督，对政府内阁官员形成压力。

第二，新闻监督。芬兰的新闻媒介不断批评和揭露政府官员违法丑闻，只要报纸有透露，司法部门就通过这些线索进行调查，不允许任何人加以阻止，直到把事情搞清楚。

瑞典的新闻媒介可以报道政府有关廉政情况，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职人员可以不受制约地向新闻界提供消息、材料，只要不涉及国防、外交机密，只要是内容属实，消息和材料来源将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保护，其他部门不得进行调查，不得打击报复。

英国把舆论监督作为促进和改善行政管、防止政府机关和公务员腐化的重要手段。议会开会辩论问题，电台、电视现场转播。

巴西注意发挥新闻机构的作用，要求新闻机构及时、深入、广泛地报道国家发生的事件，其中包括各级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

第三，上下级互相监督。瑞典实行上下级的监督，在政府官员中，上级对下级有监督的责任，上级要采取措施，以保证下级廉洁奉公，完成好任务。下级也有监督上级的责任，并可随时向上级提出好的建议，使上级领导带头廉洁奉公。

印度的腐化情报不少是通过公职人员的检举获取的，一些高级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财产与个人收入实际不相符等，就是由中、低级公职人员检举和揭露出来的。

第四，公众的监督。芬兰自下而上对官员实行公民监督。第一、任何公

民都有权向有关行政部门借阅官员的工资收入，纳税情况材料和对官员起诉、裁决的全部文件，第二、政府指导公民行使权力，保证公民在需要时不因不了解法律而无法行使权力，法律为公民提供免费服务，提供必要的具体协助；三、公民有向最高检察长直接举报的权利。最高检察长和议会总检察官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的举报。

英国在行政管理、反对腐化等问题上，公民可以旁听，还可以向政府机关索取除法律规定的机密以外的各种文件和材料。

美国总统的届、任和位

届——略同于“次”，用于表示定期会议，选举的次数。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4年，即每隔4年进行一次总统选举，总统任满4年为一届，中途接任者与被接任者属同一届。1788—1980年，美国已进行了49届总统选举。

任——有别于“届”，用于表示担任某官职的次数。

1980年当选的第49届总统里根，不是第49任，而是第40任。造成“届”和“任”数字之差的因素有二：有人连任两届以上，有人未任职满届而由他人接任。具体情况如下：

1、两届一任。第1、2届、第4、5届，第6、7届、第8、9届，第11、12届，第21、22届，第32、33届，第42、43届，均是两届一任，即一人任职两届。

2、一届两任。第14、16、24届，均是一届二任，即因前任病故或遭暗杀身亡，后由副总统接任。

3、三届两任。第29届由两人先后任职，前任威廉·麦金莱是第28届总统连任，后任西奥多·罗斯福又连任第30届。

4、五届两任。第37—41届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先后担任。

位——指担任过美国总统的实际人数，此数与“任”数也是不一致的。格罗弗·克利夫兰是第22任总统，后来他出任第24任总统，两任一位，因此，总“位”数与总“任”数相差一。

1984年美国举行的是第50届总统大选，里根当选连任他是第40任、第39位总统。

世界各国的内阁体制

内阁，是现代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行政机关。尽管各国叫法不同，如中国称国务院，扎伊尔叫全国执行委员会，格林纳达叫临时顾问委员会，前苏联称部长会议。利比亚叫总人民委员会，瑞士叫联邦委员会，匈

牙利称工农革命政府……但它们的作用却是一样的。

内阁中的各部部长一般均为内阁成员。全世界大约有 4350 名部长级内阁，如被 147 个国家和地区相除，则每一国或地区平均要有 25 名阁员。而实际上，阁员的多少因国而异，相差悬殊。阁员的数量最少的是梵蒂冈城国和列支敦士登公国，前者只有 2 名阁员，其中一名还是神职人员，后者只有 3 名阁员，掌握全国的农业、卫生和福利事务。内阁成员最多的要数前苏联，部长会议中有 135 部长级成员，仅工业就分 30 多个部。如按人口比例来看，美国是阁员较少的国家之一，只有 13 个内阁成员，平均 1800 万人才有 1 名，被称作“穷内阁”。内阁成员可以兼任数个内阁职位，世界上个人担任内阁职务最多的是印度已故总理拉吉夫·甘地，27 个内阁席位，他兼有 11 个。

各国内阁机构往往反映该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民族及语言上的特点。便如反映经济特点的有：海湾国家的石油部，因为那里盛产石油，几乎各国都有石油部；古巴有世界“糖库”之称，设有食糖工业部；越南海岸线较长，渔业生产占重要地位，设有海产部；孟加拉国盛产黄麻，设有麻业部；斯里兰卡种植园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竟设有 3 个主管种植园经济的部。反映政治特点的有：伊朗的圣战部、越南的残废军人社会部、德国的德国内部关系部、约旦的被占领土事务部、黎巴嫩的黎巴嫩南部事务和重建国务部等。反映地理特点的有：阿富汗、孟加拉、伊拉克、埃及等国的防洪部、灌溉部，因为这些国家对水利依赖较大，肯尼亚、乌干达等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境内辟有著名的国家公园，故设有野生动物部。反映宗教与文化的有：伊斯兰教事务部、宗教事务部，它多属以宗教为国教的国家，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所在国，每年有大批的信徒前往朝圣，故设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朝觐事务部。意大利是文艺复兴最早的国家，境内文物古迹巧夺天工、灿烂无比，它设立了世界上唯一的文化遗产部。反映民族关系的有：加拿大印第安人事务部、澳大利亚的土著事务部、新西兰的毛利人事务部等。反映语言的有：爱尔兰语区部；比利时的官方语言是佛兰芒语和法语，该国设立了佛兰语教育和法语 2 个部。

还有一些国家设立的部比较特别，如法国的权利下放部；刚果的扫盲部；意大利的生态学部；巴西的反官僚部；秘鲁的一体化部；乍得和新西兰等国的天然灾害部、地震损失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甚至有酒类营业执照部。

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

任用制度。从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来看，任用文官的形式主要有 4 种：选任制、考任制、委任制和聘任制。

选任制是以选举方式任用文官，适用于政治领导人。分为直接选任和间接选任，任期有限。采用选任制产生国家首脑和部分文官的有美国、法国、德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国。

考任制是通过考试的方法，以应选人员的智能优劣为客观标准，来选用所需的文官。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的方法，最广泛地罗致优秀人才。

委任制是由机关首长负责直接委任其部属，适用于对长官负责的助手和秘书等辅助人员。日本内阁其他大臣，由总理大臣任命。英国首相可以决定组阁名单，控制内阁的活动。

聘任制是由政府机关通过契约，定期聘用专门人员的一种制度。它适用于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的学者、专家和科技人员。现在，许多西方国家任用专家技术人员大都采用这种聘任制。

1. 考任制是西方文官制度的基础。西方国家文官考任制由先后衔接的竞争考试和择优录用两大程序组成。

(1) 竞争考试。由一定的机构根据行政部门职位的职务(工作任务和责任)要求，对申请担任职位的人进行测试。考试程序与录用条件要公开，考试名次要公布于众，报考人若对考试评分有疑问，允许依法提出申诉，要求复核。

对文官的考试，一般分若干等级和类别，例如，日本公务员分为上、中、下三级。参加上级考试的，必须是大学毕业程度，考试合格者，可以担任事务官。参加中级考试的，必须是短期大学(2年制)毕业程度，考试合格者担任一般职员。参加初级(下级)考试的，必须是高中毕业，考试合格者，作辅助性工作。参加上级和中级考试者，必须懂得法律。德国分为高级、上级、中给和低级四级。英国的文官考试分为行政级、执行级、文书级和助理文书级。美国政府用这种方式雇用律师、牧师、医师、护士以及邮政局、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等机构的文职人员。

文官考试的科目繁多，其内容包括4个方面：第一，知识测验，第二，智力性能测验”，包括对空间能力、数目能力、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文字表达能力、语言关系能力、察觉速度能力和归纳能力8项因素的综合测验，以测验应试人的普通能力。第三，技能测验。第四，心理测验。

在考试科目方面，日本规定得相当全面，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时事、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外语、语文及数理化知识，技术官还要进行专科的业务知识考试。

(2) 择优录用，从择优到正式录用包括3个环节：一是评定成绩。二是试用期。为确保择录用的质量，西方各国一般规定，凡考试合格所被录用的人员，在授予正式职务前要有试用阶段，考察其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通过试用考察，表现优良者可正式获得文官资格，表现一般者可适当延长试用期限。三是宣誓就职。

2. 聘任制的做法。西方国家的聘任制大体有以下4个程序：

(1) 由招聘单位在报刊上公开刊登有关招聘的启事说明，招聘工作的性质、责任、待遇，对招聘人员的资历、学历和年龄等项要求，以及招聘手续。

(2) 应聘人应向招聘单位提出申请书，同时提交个人简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科研成果、工作成绩等证件。

(3) 招聘单位成立由领导、专家、教授组成的招聘委员会，负责审查以应聘人的条件，确定聘用名单。

(4) 被录用的应聘人要同聘用单位签订合同书，内容包括责任、要求、工作条件、待遇和任期等。合同书通过双方和公证机关认定，具有法律效力，由双方和有关单位分别留存。录用后，如发现应聘人在报名时提供的情况不真实或隐瞒重要问题，聘用单位将视情节轻重，分别处理，直至终止工作关系。应聘人如发现招聘单位未按合规定办事，也可以立即提出辞职，如双方都满意，则可连聘连任。

3. 任期任届。日本总理大臣和其他大臣的任期，一般不超过4年。日本自民党的总裁必须2年选举一次，原则上只能连任两届。如果总裁加任三届，必须有2/3以上的本党国会议员推荐。执政党领导人更换，总理大臣、其他大臣和政务次官必须随着更换。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都不搞终身任职制。瑞士的联邦主席任期1年，期满后不得连任，由副主席递补。瑞士公务员行政任期4年。州政府委员的任期，因州而异，1年到5年不等，但可连选连任。阿根廷总统由选举产生，任期6年，不得连任，必须间隔一个时期后才可重新当选。德国各部门考试录用的官员，经试用合格后，担任常任文官者即为“终身官员”，将终生为国家服务，直至达到退休年龄为止。

考核制度。西方国家对文官的考核，虽然叫法不同（法国称“鉴定”，日本称“勤务评定”，埃及称“考核”，英、美等国叫“考绩”）但内容和方法基本相同，尤其是各国在文官进行考核中，都注重工作成绩的考察，根据成绩的优劣，决定职任升降和奖惩。可以说，这是西方国家考核制度的一个根本特点。

在考核方面，许多国家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例如，英国对文官实行的考绩包括10个方面：工作知识、人格性情、判断力、责任心、创造力、可靠性、机敏适应性、监督能力、热心情形、行为道德。美国国会1950年12月通过《工作考核法》，要求各机关采用工作考核制，其中包括三大因素：一是工作数量，二是工作质量，三是工作适应能力。工作数量包括：已完成的可接受的工作份数；尽职程度；工作期限；努力的效果等等。工作质量包括：工作的准确性；工作的表现和可接受性；工作的美观性；技巧和能力；作出决定或判断的健全性等等。适应能力包括：与上司及同事的合作情况；对新工作的学习能力及意愿；注意法规的能力；一般适应工作环境的能力，在考核的方法上，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英国进行考察报告制，即事先制订考绩报告表，根据此表内规定的要素和标准，由考绩委员会根据公务员平时的成绩记录及有关资料，加以考察与评定。美国实施考核的机关，由直接主管长官任考核员，负责长官任复核员。主管长官在评定考绩等级时，先与公务员商谈、交换意见，然后再作评定。日本由各机关首长授权所属高级职员

办理考绩。

晋升制度。目前，西方各国实行晋升制度大致有 4 种形式：考试晋升制、功绩晋升制、年资晋升制、越级晋升制。

日本公务员的晋升，基本上采用考试晋升制。英美公务员的晋升，普遍采用功绩晋升制，但也有不少机关采取按年资升迁的办法。德国则实行以长官考核为主的公务员晋升制度，奥地利的晋升制度规定可以自我申请担任领导，科员可以申请当科长，处长或局长。申请提出后，由选拔委员会审定并向上级推荐。

什么是公务员

“公务员”一词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根据各国文字中原文含义的不同，中文译法也不尽相同。如法国的 *Fonctionnaire* 译为“公务员”，美国的 *Governmental Employee* 译为“政府雇员”。英国的 *Civil Servant* 的原义虽然是“文职人员”或“公务员”，并无“官”的含义，但是在英国这些文职人员有自己的语言，叫“官话”；有自己的服装，叫“官服”；有自己的住宅，叫“官邸”。他们去上班时，总是头戴黑色礼帽，手挽黑色雨伞，穿着整齐，彬彬有礼。因此，习惯上把 *Civil Servant* 译为“文官”。

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公务员就国家机关中的文职工作人员。他们是用相对于武官和法官而言的，是办事的“事务官”，而不决策的“政务官”；他们受雇于政府，不是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或地方官员。但由于各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差异，其所使用的公务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尽相同。如美国规定行政部门的所有官员包括选举产生的政务官统称“文官”。而日本则把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及法院、国立学校、医院乃至政府经营的企事业单位供职的所有人员，统称为公务员。

国外公务员晋升制度简介

英国。英国公务员的晋升，是鼓励公务员提高业务能力和做出工作成绩的重要手段。其中，低级公务员的晋升偏重资历。中高级公务员的晋升，注重功绩。

公务员晋升的主要程序是：（1）各部门提升委员会公布官职空缺表，上报公务员委员会审核后公布；（2）提升委员会依据公务员的年终考核报告，公布候补晋升名单；（3）部内长官对晋升者进行能力考试后，确定晋升名单。公务员晋升通常采用逐级递升的方法，每 4 至 6 年晋升一级，一个普通公务员要晋升到高级公务员的职位，一般需要 25 至 30 年左右的时间。有大学学历的行政见习官，经公务员学院培训，才能越级提升。

公务员的考核、晋升由各部长官负责，各部专设咨询性机构——提升委

员会，主管本部门公务员的考核、晋升等事务，但部门行政长官有最后决定权。如果在晋升的程序中，有不公正或违法行为，公务员有权向有关仲裁机构申诉。凡依仗关系取得晋升资格的，查出后取消资格。

美国。美国公务员的晋升普遍采取功绩晋升制，公务员的晋升同其工作考核结果、培训结果好坏有直接关系。美国《文官制度法》细则虽然规定公务晋升一般应当经过晋升考试，但是实际上政府各部门的晋升方式主要有四种。

一种是委任晋升制，由行政长官通过委任办法提升职位。第二种是年资晋升制，工作达到一定年限，没有过失者，即自动晋升。第三种是考核晋升制，通过晋升考试，以考试成绩为依据决定提升。第四种是混合晋升制，即根据工作成绩及工作年限两种因素决定晋升。

美国政府各部门的晋升制度还有“部内晋升”与“部外晋升”两种。所谓部内晋升，就是晋升人员只在本部内部推选，其他人不得参加。所谓部外晋升，就是准许其他部门的人员参加提升考试，谁的成绩最优秀就提升谁。

日本。日本的公务员，无论是职务晋升或工资升级，都以年功序列制为基本原则。年功序列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工作年限；二是工作成绩。

日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的晋升必须通过竞争考试或选考，从下一级的职员中选拔。但从实施状况来看，公务晋升已不再经过竞争考试，而是以工作年限为基础，同时参考工作成绩和能力以及其他因素（如：品行、健康状况等），平时印象和领导的推荐也起作用。公务员每工作4年左右就可以晋升。新公务员工作4年，一部分被提为助理股长；股长工作4年，一部分被提为课长助理；课长助理工作4年，一般可提升为课长，在正常情况下公务员到37、38岁就可以当课长。

日本的公务员制度

1947年10月，日本制订了国家公务员的根本法——《国家公务员法》其目的是：“确立国家公务员——职员的各种根本基准，规定用民主的方法选拔和指导职员执行其职务，使其能充分挥效率，以保障为国民办公务既民主又有高效率。”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分“特别职”与“一般职”两类。特别职国家公务员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人事官司及检查官司、内阁官房长官及总务长官与副长官、法制局长官、政务次官、大臣及特别职长官的秘书官、裁判官及裁判所职员、国会职员、国别职以外的大多数公务员，均系一般职国家公务员。《国家公务员法》有三大特征：一是规定了采用以职阶制为中心的人事行政制度，即把一切职务按职种（职务的种类）与职级（依照职务的复杂程度与责任轻重划分的级别）进行分类整理，明确指挥系统与责任；二是规定了设置为实施这个制度而设立的机关——人事院；三是规定了录用、提升主要通过“竞争考试”的方法实施。

专门机构：人事院。人事院是综合调整一般职国家公务员的职阶、任免、待遇及其他有关国家公务员的一般人事行政，以及审查国家公务员考试及利益与处分等事宜的行政机关。它兼有准立法和准司法的职能。为确保人事行政“在政治上的中立性”与“专业性”，人事院具有比其他行政机关强的独立性。人事院的工作有：掌管改善待遇等工作条件，建议改善人事行政，确保职阶制，公正地实施考试及任免、待遇、进修、身份、奖罚、上诉及其他有关国家公务员的人事行政，并保护其利益。

考试·录用。《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公务员的录用以及提升都通过“竞争考试”实施。当然，在必要时也可以采用“选拔”方法。

待遇·奖惩。国家公务员的报酬应按法律规定的报酬准则支付，不得在准则之外支付金钱或有价物品。这里所说的报酬准则，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民间企事业职员的薪金标准为基础，还规定所有的国家公务员必须做全体国民的服务员，为公共利益竭尽全力进行工作。为保证这一要求得以贯彻，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官职，若奉令兼职则不得另取报酬，不得兼任商业、工业、金融业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公司及其他团体的负责人、顾问或理事，也不得自办营利企业。

《国家公务员法》规定了严格的管理措施。主要有：

1. 国家公务员如违反《国家公务员法》和依据该法发布的命令，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或读职，违法乱纪而有损于全体国民的服务员的称号，只要有其中一项，就须受免职、停职、降薪或警告的处分；停职期间不得领取报酬。2. 如勤务成绩不佳，因身心不健康致使执行勤务有困难或不胜任，不具备其官职所需的资格，由于“出现废职或人员过剩”，只要有其中一项，便可予以降职或免职。3. 如因身心不健康而需长期休养，因涉及刑事案件而受起诉，只要有其中一项便可令其休职，休职期间不得领取任何报酬。在保障国家公务员利益方面，从内阁总理大臣到有关政府机关的首长应制定并努力实施有关国家公务员进修、保健、安全和福利的计划。它还规定了公务员的退休金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以维持本人及其退職或死亡时直接扶养的家属以后过适当水平的生活。”《国家公务员法》不适用于特别职国家公务员。据统计，1985年度末，日本一般职国家公务员为850988人、特别职国家公务员为327743人，与国家公务员相区别的是地方公务员，系指地方公共团体职务的职员，包括都道府县的知事在内；也分特别职与一般职，前者适用《地方自治法》，后者适用《地方公务员法》。1985年度，地方公务员总数为3338914人。

美国的联邦公务员法

产生的背景。18世纪70年代美国建国之始，头几位总统用人是以量才录用而不考虑党派关系为原则的。19世纪初，这个原则被破坏，当选总统总是大量更换政府工作人员，代之以自己所属政党的人，不再考虑条件是否合

适。这样的做法，在美国的政治术语中叫做“政党分赃制”。南北战争结束后，这种人事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官官相护，贪污腐化成风，成为各级政府中的严重问题。广大选民对此极其不满，导致国会 1871 年通过一项立法，授权总统以考试办法录用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但国会仅仅是通过立法，没有拨出经费，使这项立法两年后流产。1881 年 7 月 2 日，公众又一次强烈要求改革公务员聘用制度，导致国会 1883 年通过《联邦公务员法》，因它是一位名叫乔治·亨特·彭德尔顿参议员提出来的。也称为《彭德尔顿文官法》

主要内容。联邦公务员法的主要宗旨是成立作为联邦政府机构的美国公务员委员会；规定聘用公务员采取考试办法，而不是凭私人关系或出于党派考虑；联邦职务要注意各州之间适当分配；禁止按总统竞选时的捐款数目取得联邦职务。后来又补充了许多法令和细则。各州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再制定了州公务员条例。

在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是指有别于军人和选举产生的官员的政府工作人员。

美国公务员委员会主管联邦公务员。委员会自 1883 年成立起，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扩展和完善，现在已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政府部门，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劳动人事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经有 95% 以上的联邦公务员是通过该委员会的考试被量才录用的。联邦公务员包括可提供各种各样服务的员工，其中有警官、消防队员、清洁工、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等等。有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属于美国公务员委员会的管理范围，如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和原子能委员会的职工，这些部门有他们自己的考试录用制度。

美国公务员委员会的职责是主持就业者的考试、确定职业分类、审定职务地位和任期、保证就业机会均等、制定保险和保健计划、评定工资等等。

委员会的特点是订出复杂的职业分类，使就业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特长所属的类别。职业分类根据职责的难度和工种划分得非常详尽，按照分类定出相应的工资。

绝大多数就业者都要经过考试，考题因申请的职位而异，但必须尽可能切合实际。就业者根据自己的复试成绩进入相应一级的位置。有口试，也有笔试。及格者不一定马上能就业，而是列入录取名单，一旦某个机构有空缺，就从名单的前三名中挑选。复员军人的考试成绩有附加分，以示照顾。就业者被选中后，要由政府调查其背景，如果担任涉及国家安全的工作，还要调查是否忠诚可靠。

特殊情况。所有联邦机构都保留几个职位不受联邦公务员法的约束。包括部和局（署）的负责人。他们是通过政党关系任命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政府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但除几个参与制订政策的人以外，联邦公务员不得参与党派政治。

联邦公务员的职业分数和工资级别分成 18 大类 (CS—1 至 CS—18)。工资同私营工业大致相当,员工的升迁或调动。不影响其公务员的权利。一直有一种叫做“横向进入”的传统,这是指各种年龄和级别的人经常在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往返流动。

新加坡、韩国、斐济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基本特点

新加坡。新加坡公务员工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里是富有成效的,形成了独自的特色。

1. 工资制度灵活、简单。根据公务员分类分别制定工资表,针对性强。工资结构中既有固定部分,又有浮动部分,使工资公务员的表现和经济状况密切结合起来,方便灵活,激励性强,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2. 公务员的工资由财政部和全国工资理事会两家分别管理,能够做到公正合理,保持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私营部门大体平衡。

3. 以单一薪制为主,奖金和津贴部分很少,而且政府定期浮动工资转入固定工资,保证基本工资占主导地位,有利于工资职能的发挥。

4. 新加坡公务员工资待遇十分优厚。工资确定以职责为主,内部差别很大,且不说政务类公务员,仅就业务类公务员来说,超等公务员的最高工资与四等公务员的最低工资相差 71 倍,这是各国所罕见的。

韩国。由于受东西文化的交叉影响,韩国的公务员制度和工资制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 在工资决定中主要考虑职责繁简难易程度,职务之间工资差距大,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同一职级的,工资标准相同,公平合理。具有明显的职位分类精神。

2. 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工资管理体制。无论中央政府公务员,还是地方政府公务员,工资待遇由中央统一决策,执行统一的工资标准。

3. 公务员工资水平与私营企业人员大体平衡,公务员的流失率很低,稳定了公务员队伍,保证了国家行政的高效率。

4. 各种津贴、补贴名目繁多,但大都与职责相关,多而不滥。高级官员津贴十分优厚。奖金性质的津贴相当于公务员五个多月的工资。

5. 公务员的工资足以维持相当水准的生活,社会地位十分优越。

斐济。斐济是发展中国家里为数不多的直接列入职位分类工资的国家之一,工资制度的运行比较正常。

1. 各类公务员统一进行职位公析和归等到级,根据其工作性质的差别分别制定工资表,切合实际需要。

2. 在工资晋升中,注意吸收效率障碍测试法,增强功绩晋升的观念。

3. 公务员工资水平通过集体谈判方式调整,不仅考虑企业同类人员工资水平,还兼顾物价因素,保持公务员与企业人员之间工资平衡,并保护了公

务员的实际收入。

4. 津贴项目少，多为通用性津贴。

香港、台湾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基本特点

香港公务员待遇十分优厚，每年用于工资的支出占政府支出的 25—37%。优厚的工资待遇被香港人称为“金饭碗”。香港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基本特点是：

1. 香港公务员工资制度具有明确的目标，并与切实可行的措施相配套。
2. 公务员工资水平高，在社会中处于中上等水平，而且纪律人员、廉政公署人员和警务人员的工资水平高于一般公务员工资水平。
3. 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运行机制十分完备，政府不仅在财力上保证加薪，而且平衡比较原则也能如期得到贯彻，这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是少有的。
4. 公务员的工资决策方式是在民主协商量的基础上的行政决策方式，既适应集权制的需要，又不过于死板。
5. 工资标准表分类较细，适合各类人员工资实际的需要。

我国台湾地区自 60 年代以来，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对人事制度也进行了多次改革，几经周折，建立了一套具有东方特色的公务员制度，与之相关的公务员工资制度亦几经变迁，日趋完善。

1. 在工资结构中，官等与职等并重，成功地将“人”的因素与“事”的因素结合起来，实行同工同酬，计值给俸。
2. 在工资项目中，本俸与年功俸并立，突出功绩晋升，有利于发挥工资的激励功能。
3. 在工资计量上，实行俸点制，方便灵活，富有弹性，保证了工资随财政状况、民间企业、工资水平和物价的变动而变动。
4. 工资表统一，涵盖性强；以基本工资为主，各种津贴项目较少。
5. 公务员工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国外普遍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

最低工资是一种规定工人事实工资下浮最低限度的法定工资，只要工人按规定从事了一定量的劳动，就有权得到不少于最低工资的报酬。最低工资制度通过国家规定企业(私营雇主)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必须达到某一限额(即最低工资标准)之上，使之能满足工人本人及其一定数量的家属所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

最低工资制度发源于 19 世纪末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目前这一制度已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原前苏联及东欧各国，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铁饭碗”相继被打破，亦开始重视这一问题。

最低工资制度之所以能广泛实行，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两大功能：一是为收入低微或不稳定的工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维持一定的社会购买力，并借此来履行社会公平原则，维护社会安定；二是有利于国家对社会分配方面和劳资双方事务进行必要的干预。

国外企业的新工资制

新近不少国家推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工资分配制度，使企业工资结构更加趋于合理，现介绍几种。

日本的职能工资制。近年来，日本对企业职工原来的年功序列工资和升级制度作了改进。普遍推行了以能力为主，兼顾年资的“职能工资制度”。这种工资构成一般按五种情况区分：按学历区分初级工资。对新职工的起点工资原则上按照学历划分等级，三年内不定级，但工资每年按等级增加4%左右。按年龄区分最低工资。一般在同等条件下的同一级别中，年龄大的工资可比年龄小的高一些。据职能划分等级工资。根据企业每个工种所需的知识、体力、精神上的负担和掌握该工种所需时间的长短等四个项目，分别计分，再按分数划分等级。按能力和年资相结合定期加工资。一种是升级加工资，按照个人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的考核而确定；另一种是每年增加部分工资，这是根据个人当年工资表现确定的。按实绩发额外奖金。每年6月、12月各发一次，奖金的多少则根据职工个人出勤、产量、产品合格率计算，不搞评比。

美国的协商工资制度。在美国企业中，企业职工和管理人员的工资由他们自己与企业主协商确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这种工资制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人工资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二是重工业、建筑业工资待遇高而相对稳定。美国汽车工业工人工资平均每小时可达20美元，其中12美元以工资形式支付，剩余部分用于交纳退休金、卫生保健基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等等。

英国的半浮动工资制度。这是英国新近推行的一项工资制度。目前在英国工商企业中，雇主不再将雇员原固定工资的额全部支付给雇员，而是将雇员原固定工资的 $\frac{2}{3}$ 定为固定工资，其余 $\frac{1}{3}$ 则同企业利润挂起钩来，由企业盈利多少来确定。英国政府认为，实行半浮动工资制具有三点好处，第一，有利于减少社会失业人数。工人工资随着企业盈利多少而增减，这可使企业在面临困境时削减工人工资，而不裁减工人的人数。第二，有利于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企业主普遍乐意多雇工人，因为支付给新工人的工资及在职工人工资的 $\frac{1}{3}$ 。第三，有利于改善劳资关系，由于工人工资的多少取决于企业利润高低，这就促使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关心企业的兴衰。

巴勒斯坦国简介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地处欧、亚、非洲交通要冲。公元前 64 年，罗马帝国入侵巴勒斯坦，到公元 132 年，这里的犹太人除被杀者外，绝大多数流散到欧洲和世界各地。公元 7 世纪后，这里的主要居民是阿拉伯人。

19 世纪末，“犹太复国运动”兴起，西欧等地的不少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被英国占领，后来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7 年 11 月 29 日，第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即 181 号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领土约为 1.15 万平方公里。犹太国领土约为 1.52 万平方公里。

1948 年 5 月 14 日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建立后，随即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把它的土地扩张到 2.07 万平方公里，迫使近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离开他们世居的家园。流落异乡，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又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侵吞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最后剩下的全部巴勒斯坦土地，又有 50 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沦为难民。同时以色列还侵占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西奈半岛。

从以色列扩张侵略至今的 40 年里，巴勒斯坦人民同以色列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由于以色列的阻挠和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1987 年 12 月 3 日，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发动起义，掀起了历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以色列占领的抗暴斗争，强烈要求恢复民族权利，建立独立国家。1988 年 10 月，巴解组织在突尼斯召开领导机构和各派别领导人联席会议，为建立巴勒斯坦国做了准备。

1988 年 11 月 15 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 19 次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独立宣言》，由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隆重宣布巴勒斯坦国诞生，首都定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国

以色列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国家。它是根据 1947 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于 1948 年 5 月 14 日建立的，其面积为 1.49 万平方公里。在现有 470 万人口中（按；1992 年 1 月 25 日《人民日报》称 500 万、1 月 24 日《参考消息》称 453.7 万），犹太人占 80% 以上，其他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等。希伯来语为国语，与阿拉伯语均为官方语言，通用英语。犹太教为国教；80% 以上的居民信犹太教，其余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其它宗教。以色列刚建国时，首教设在特拉维夫，1950 年迁往耶路撒冷。1980 年 7 月 30 日以色列议会通过法案，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但它的政府所在地仍在特拉维夫。

以色列主要民族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前 11 世纪曾在这里建立希伯莱王国。后王国一分为二，成为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公元前 722 年和 586 年，这两个王国先后被亚述人征服和被巴比伦人灭亡。公元前 63 年，罗马人入侵，大部分犹太人被赶出这一地区，流亡世界各地。此后，阿拉伯人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而许多犹太人也陆续返回这一地区。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在这里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人国两个国家。

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光荣的责任。

自古以来，藏族就生息繁衍在我国的青藏高原上。早期的汉文典籍如《后汉书》、《隋书》、《北史》等，也都记载了包括藏族在内的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驻地概貌、物产等。到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了吐蕃王朝，他在政权建设中十分注意发展同周边的友好关系，与唐朝修好。为此，他派大相禄东赞携带厚礼到长安请婚。唐朝为了边境安宁，遂从其请，并于贞观十五年（641 年），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红夏王李道宗奉命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青海，松赞干布亲率大兵仪仗前来迎亲，结为秦晋之好。自此，吐蕃与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友好关系日益加深。八世纪初，吐蕃赞普弃隶缩赞又向唐室请婚。景龙四年（710 年），唐中宗以金城公主下嫁，结为婚媾。此后，双方虽时有纠纷，乃至兵戎相见，但毕竟和平相处的时候居多。长庆元年（821 年），唐与吐蕃又分别在长安和逻娑两地会盟，追述甥舅亲谊，“商议社稷如一”大计，签订了盟约，史称“长庆会盟”。

公元 842 年，吐蕃王朝解体。一直到元朝统一中国的四百余年间，藏族地区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而在中原地区，唐朝崩溃后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政权，这四百年间，藏族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生活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

十三世纪初，蒙古势力在大漠南北崛起。1206 年，成吉思汗建蒙古汗国。1239 年驻守凉州（今甘肃武威）的蒙古官员阔端（成吉思汗孙）派将官多达那波率军入藏，兵锋曾达拉萨北之热振寺和杰拉康寺。多达那汉返回凉州汇报了卫藏政教情况后，蒙古王室于 1244 年派人持函入藏召萨迹派首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俗称萨班）赴凉州商讨卫藏地区归附蒙古事宜。萨班应召携侄儿八思巴和恰那同行，以表明受命之诚意。1247 年萨班与阔端的凉州会商，议定了卫藏归顺蒙古的条件。从此，卫藏地区为蒙古汗国的一部分，纳入元朝的版图。

元朝统一中国后，世祖忽必烈根据西藏的实际进行治理。首先在中央设释教总制院（1288年改为宣政院）专门机构管理西藏事务。其首席官员常由丞相兼任，副职则由帝师荐举的僧人充任。其次设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今卫、藏、阿里（含今拉达克）地区。三是在卫藏地区设13个万户府和若干个千户所，任命当地首领管理军民事务。四是设帝师。1264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领总制院事，1270年复命其为帝师，赐玉印，诏书。自此元室设帝师职遂成定制，帝师也就成为由皇帝任命的中央高级官员。

1368年，元为明所取代。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伊始就十分重视西藏地位，曾派官员赍诏前往藏区招谕藏族诸部首领归顺新朝。1372年，乌思藏元故摄帝师喃加巴藏卜遣使向明廷进贡，次年则躬身进京朝觐，被封为“炽盛佛宝国师”，授玉印。后来他又向朝廷荐举藏地元故官百余人，皆授官职。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在清入关前，西藏新兴的格鲁派（俗称黄教）首领第五世达赖喇嘛等在蒙古人固始汗的支持下，于1642年派使者到东北朝觐清太宗，建立感情。1648年，清顺治帝在北京接见明故阐化寺使者妙胜慧智灌顶国师，赐之浩命。1652年，黄教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奉召进京朝贺，受到顺治帝的隆重接待。在他返藏时，又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嘛喇嘛”，赐金册、金印。自此，达赖喇嘛这一称号正式成为中央政府尊封的称号，并始具政治和法律意义。

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是根据西藏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加强的。初为承袭明制，后因其地发生了几次变乱和境外廓尔喀人入侵，遂调整与完善治藏政策。1792年平定廓尔喀入侵后，乾隆命福康安等妥立治藏善后章程。这些章程后来汇集成二十九项条款，称“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译成藏文颁布西藏地方执行。“二十九条”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如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其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建立正规军3000名，军官中代本须呈皇帝任命，其余军官均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选择年轻有为者担任；达赖喇嘛、班禅等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要经由驻藏大使主持金瓶掣签，当众确认，最后报皇帝批准才能生效；西藏一切对外交涉均须通过驻藏大臣处理，噶伦乃至达赖喇嘛不得私自与外国人交往。此外，对西藏地方的行政事务管理、官员升迁任免、税收差役的征收摊派、司法治安的监督、寺庙的供养管理。以及对达赖喇嘛、班禅收支的审核等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一直是治理西藏军政事务和边境问题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影响极为深远。

1911年，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建立起中华民国。1912年，孙中山在其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明确宣布藏族是中华民国大家庭中的一员，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1912年4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也发布命令强调西藏的地位任何人不得改变。1931年，西藏代表参加了中华民国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此后的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宪政会议都有西

藏代表参加，并被选举、任命为中央政府的官员。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谈判经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完成祖国统一的事业，解放西藏成为历史的必然。毛泽东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通知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代表来中央进行谈判。

此时掌握着西藏地方政权的大扎等人，在帝国主义分子唆使下，不仅继续在分裂祖国的活动，而且在昌都部署藏军主力，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

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为进军西藏打开大门。以大扎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挟持达赖喇嘛逃到边境重镇亚东。11月间，西藏地方当局研究对策，大扎下台，十四世达赖亲政。他立即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报告了他亲政情况，并表达了和谈愿望。毛泽东也致信达赖。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商定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1951年2月，达赖派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和桑颇·丹增顿珠等人经昌都、康定、雅安、重庆、西安，于4月22日抵京，凯墨·索朗旺堆和土登丹达则转道印度、香港，于4月26日到达北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经中央特邀率堪厅的官员于27日抵京。

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齐聚北京后，中央人民政府派了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于4月29日开始进行谈判。根据西藏地理、历史、宗教等方面的特殊情况，中央全权代表提出了系列建设性意见。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也对中央提出具体问题和要求。班禅大师在谈判过程中也做出了积极贡献。经过近一个月的协商，就一切重要问题作了详细讨论后，对和平解放西藏取得了协议，谈判于5月21日结束。

5月23日，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勤政殿举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双方代表签字后，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先后致词。李维汉说在全部协议条文和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央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的要求，主要是：西藏地方政府坚决脱离帝国主义影响，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开进西藏，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归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现有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除此之外，协议的大部分条文，都是关于西藏内部关系和内部事宜的处理。阿沛讲话说，由于毛主席民族政策的感召，藏族内部自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之间长期以来的不和睦，得到公平的解决，朱德讲话说，这个协议符合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援助西藏人民清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伟大祖国的国防，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希望西藏地方政府切实负责地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

议，尽快协助人民解放军开入西藏。签字仪式在庄严、团结的气氛中结束。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李维汉等人的汇报，并指示，部队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要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不能增加藏族群众的负担。24日晚，毛泽东设宴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亦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10月24日，十四世达赖致电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协议”。26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进驻拉萨。

班禅地位及职权确定的经过

1951年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随着谈判的深入，又一个更加艰难的，敏感的问题出现了。

在西藏，班禅的地位仅次于达赖。但是4月27日班禅大师抵达北京时，西藏和谈代表团却以低规格迎接班禅，这在藏族历史上是罕见的。不过，回溯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失和数十年来的历史，这又并不奇怪了，更何况到谈判开始，噶厦政府连十世班禅灵童的合法地位还未予以承认呢。由此可知，当中央代表提出，要把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列入协议时，西藏和谈代表是怎样忌讳了。从九世班禅逃到内地算来已有28年了，现在十世班禅迟迟得不到噶厦承认，双方的隔核如巨大的冰谷。西藏和谈代表从一开始就关闭了讨论班禅问题的大门。他们认为，要讨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与班禅问题没有关系。况且，九世班禅圆寂后，从青、康、藏地区共遴选了三位班禅灵童，到现在为止，谁是真正的班禅大师的灵童，不仅噶厦没有表态认定，连中央政府——无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共产党中央——都还没有正式颁发封文。如此，十世班禅的合法地位何以确定呢，讨论班禅问题又有什么必要性呢。谈判由此陷入了僵局。

为寻找打开谈判僵局的钥匙。5月15日深夜，李维汉限令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必须在第二天把班禅的合法性这个问题搞清楚。恰巧堪厅原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有先见之明，将十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都带在身上，原来，早在1949年当国民党要从南京撤退时，计晋美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中积极进行活动，请求批准班禅灵童。李宗仁代总统终于在1949年6月3日颁布封文：“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随即派新任蒙藏委员会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主持坐床大典。同年8月10日，在专使关吉玉和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主持下，在塔尔寺普观文殊殿前大讲经院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大典。

有了这一纸封文，一切情势都变了。5月16日举行第五次谈判时，中央和谈代表将各咱证明包括十世班禅坐床时，达赖原驻南京办事处代表参加的

照片，都摆在了西藏和谈代表面前，他们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李维汉首席代表说：你们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而班禅是西藏僧俗人民尊贵的领袖，明天休会，你们去朝拜大师吧！5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的五位代表连同他们的随员，前往畅观楼。拜觐了年仅14岁的班禅额尔德尼大师。他们完全是按照西藏历史上参拜班禅大师的礼仪，行了献曼杞（塔供）的大礼，显得毕恭毕敬，无比虔诚。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就得恢复班禅大师固有的地位及职权，就必须把这一条写进协议里法定化。西藏和谈代表表示还要发电报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请示。

5月19日下午举行第六次谈判，中央和谈代表说明协议上要列入班禅问题，是讲对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是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这样，西藏和谈代表同意了，终于达成了协议。不过，阿沛和其他代表对此仍然忐忑不安。直到5月28日，和谈代表团接到达赖来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至此，代表团全体成员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一国两制”与“一国两府” 有何本质区别

我们提出的“一国两制”与台湾当局鼓吹的“一国两府”有本质的区别。

“一国两制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允许存在两种制度，即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几十年不变。这是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在这个国家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能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当局只能是地方政府。

而台湾当局提出的“一国两府”，鼓吹在一个国家里存在两个“对等”的政府，实际上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是走向分裂，不是迈向统一，这是广大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一国两制”古已有之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辽代实行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它实行达200年（公元926—1125年）之久。

辽为契丹族建立。契丹族世居中国东北辽河流域，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以游牧为生兼事渔猎。建国于唐五代，占有长城内外一大片地方，今天的北京就包括在内。当时它是东亚第一强国。据辽史记载，它的属国有60余国，日本、波斯（伊朗）都在其中。它较蒙古更早100年进入帕米尔高原以西地方建立一个中国政权（西辽）。

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与汉族农业社会截然不同，这不仅在语言文字上

不同，在风俗习惯、文化方面亦大不相同，契丹自进入中国后，为适应两个不同的社会，乃实行不同的制度（历史家称它为“二元政治”）。在契丹本土由契丹大可汗以契丹法直接统治，在汉地用汉人以汉法自治，而由大可汗间接统治。辽史上说：“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宋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照。”在契丹境内的汉人移民的州部，也特设汉城以居汉人。汉城有上京、东京、中京等 40 余处。并在三京汉城设有国子监（大学）、孔庙、佛寺、道观等，这无异是小自治城。

政治风云

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

加沙地带位于巴勒斯坦西部，靠近埃及边境和地中海，面积约 350 平方公里。那里的居民有大约 90 万人，主要是巴勒斯坦人和一些其他阿拉后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建了 14 个犹太人定居点，共有大约 5400 名犹太移民。据有关资料统计，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 3.9%，目前加沙地带的人口中 76% 为 29 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

加沙属干旱地区，1/3 的土地是沙丘，水源比较贫乏，农业靠井灌，主要种植柑橘。除农业外，在加沙地区还有一些陶器、食品和纺织工业。在 1993 年 3 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行军事封锁之前，加沙地带每天都有大约 4 万巴勒斯坦人进行入以色列境内上班，这些人主要从事建筑、搬运等重体力劳动。

在加沙地带各类学校 145 所，其中包括埃及伊斯兰著名学府艾资哈尔大学的一所分院和一所伊斯兰大学。目前在校学生有 18 万人。145 所学校中有 45 所是由联合国有关机构出资兴办的。此外，在加沙目前有 7 家医院和 115 家医疗诊所。

与加沙相比，杰里科镇只是一个很小的城镇。它位于约旦河西岸靠近死海的一片洼地，面积约 20 平方公里，人口大约 1.5 万，主要是巴勒斯坦人和少数约旦人。那里没有犹太移民点。杰里科东北 8 公里，便是联结约旦河东西两岸的重要纽带——“侯赛因国王大桥”。

虽然杰里科是个小镇，但却是个著名的旅游胜地。杰里科所处的洼地低于海平面 300 米，被认为是世界上所处位置最低的城市，仅这一点，每年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此外，杰里科还被视为人类最早兴建城市的地方。据考证，杰里科以西 2 公里的比宁古城遗址距今已有大约 9000 年历史。正是因为这一点，杰里科镇中有不少人以出售旅游纪念品为生。另外还有一些人从事农业，或到附近的一些犹太移民点的小型工厂做工。

杰里科地处约旦河谷，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是个美丽的绿洲。小小的杰里科城内只有一家医院和 3 个诊所。城内用电靠以色列全国供电网来提供。此外，城内还有 7 家饭庄和 3 个汽车加油站。

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

以色列在 1967 年“六·五”中东战争中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及东耶路撒冷等阿拉伯领土，开始向这些阿拉伯领土迁入犹太移民，建立所谓犹太人定居点。

一般来说，以色列建立的定居点可分三种，即以以色列边防军垦兵团建立的准军事性质的“纳哈尔村”；犹太移民建立的“定居点”；在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建立的犹太人的“公共村”。

据不完全统计，自 1967 年至今，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修建了 148 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里现居住着近 11.5 万犹太人。此外，以色列还在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及周围地区建造了一些犹太人居住区。

拉宾上台以后，宣布冻结修建“政治定居点”的活动，而“安全定居点”的修建则不受影响。

所谓“政治定居点”，是指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密集居住区兴建的犹太人定居点，主要是为实现“大以色列”的政治目标服务。“安全定居点”是指在约旦河谷、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兴建的犹太人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被认为对以色列的安全具有很大影响，不仅不能停建，而且还要继续扩建。

柏林墙的变迁

1945 年，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根据克里米亚声明、波茨坦协定以及其它协议，苏、美、英、法 4 个战胜国分区占领了德国及其首都柏林。1947 年到 1948 年间，西方 3 国合并了它们在柏林西部和德国的占领区，于 1949 年 9 月 20 日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 年 10 月 7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原苏占区成立，同时宣布把在其境内的柏林定为首都。1949 年 12 月，西柏林市议会进行选举，成立了西柏林市政府。从此，柏林城一分为二，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城两制”的奇特现象。50 年代，西方利用西柏林对前民主德国进行政治、思想的颠覆和破坏。同时，前民主德国大量专家、熟练工人因各种原因，纷纷经由西柏林流入德国。据统计，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61 年 8 月，前民主德国约有 269 万人流入德国和西柏林，占前民主德国总人口的 1/6。为此，前民主德国政府根据人民议院通过的法令，于 1961 年 8 月 12—13 日，派大批警察和工人战斗队，在西柏林四周拉上了 165 公里长的铁丝网，只留下 9 个过境通道。后又用水泥预制板和砖代替了铁丝网，成为闻名的“柏林墙”。165 公里的柏林墙，有 45 公里横穿柏林市区。沿柏林墙遍布电网、地堡、弧光灯、了望塔等警戒设施。要想非法越境，几乎没有可能。进入 80 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西方人一再要求拆除柏林墙。1989 年 11 月 9 日，前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作出决定：开放柏林墙所有通道，前民主德国公民可以人所有过境站离境，自由进入西柏林。这一措施震惊了全世界。边界开放已使柏林墙形同虚设。接着，前民主德国从 1990 年 1 月 20 日开始销售柏林墙。起初每块高 3.6 米、宽 1.2 米、重 2.6 吨的柏林墙售价 8000 美元，后来上涨，每块竟高达 10 万美元，而它的实际价值只有 190 元美元。法国已购买 3 块柏林墙，拟树立在巴黎近郊拉苔芬斯商业区

的拱型大楼附近。这座新组成的约 8 吨重的柏林墙上面，有原柏林墙西侧居民涂写的标语和漫画。它作为一座纪念建筑物，以志东西方之间“铁幕之倒塌”。

波德边界的变迁

波德边界问题应追溯到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争的结束使 18 世纪末被俄普奥第四次瓜分的波兰国家得以重建。波兰与德国的边界由凡尔赛和约确定，除传统的波兰领土外，波兰获得了原属德国的西普鲁士，建立了通往波罗的海的波兰走廊。在波兰与前苏联边界问题上，西方列强建议划一条以民族划分的边界，又称寇松线，这条线以东的居民大都为非波兰人。但随即发生的苏波战争导致了里加条约的签订，波苏边界划定在寇松线以东，又称里加线，它使波兰获得了大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土。1939 年 9 月，希特勒德国发动闪战，越过德波边境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前苏联军队随即越过苏波边界进入波兰，并与德国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定界”条约，确定了双方各自在波兰的占领地区。1941 年 6 月，法西斯德国越过德苏在波兰的分界线进攻前苏联，前苏联对德宣战后，迫于英美及波兰人的压力，废除了与德国分割波兰的协议，但坚持战后的苏波边界应为寇松线。德黑兰、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关于波兰边界都引起激烈争论，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原德国的东普鲁士北部划归前苏联俄罗斯联邦，包括哥尼斯（现称加里宁格勒）；东普鲁士其余部分划归波兰；波兰还取得了两次大战间的但泽自由市领土；寇松线作为波兰与前苏联的边界；为补偿波兰割给前苏联的寇松线与里加线之间的广阔领土，决定将波兰与德国的边界西移至奥得河与西尼斯河一线，并将奥得河西岸出海口处的斯德丁（今称什切青）港也划归波兰。新的波兰西部边界与原波德边界之间的 700 多万日耳曼人逃亡或被驱逐到德国，但仍有数百万德意志人留在这里，形成波兰的日耳曼少数民族问题。另外，200 多万东普鲁士的德国也被迫逃到东、德国，而几百万从划归前苏联的原波兰领土上流散出来的波兰人则被安置在波兰所获得的德国领土上。波兰边界就这样确定下来直到今天。

纳粹德国到底哪天投降的

这一历史事实，本不算问题，但由于各自的立场和计算方法不同，而出现了差异。如：有的书上说 1945 年 5 月 7 日德军向英美盟军无条件投降，5 月 8 日欧洲战争结束；有的书则说德国签订无条件投降书的日期是 1945 年 5 月 9 日。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说法的不同呢？

1945 年 4 月 30 日苏军将胜利的红旗插上柏林国会大厦，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5 月 2 日苏军攻克柏林，苏军与英、美盟军在易北河会师。希特勒

的接替者邓尼茨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暗地里派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与英军统帅蒙哥马利元帅联系，准备进行“局部投降”。因此于5月7日在法国兰斯举行了一场德军总参谋约德尔等代表德国向英美无条件投降的仪式。

这次签降的程序和地点显然都是不恰当的。前苏联政府向英、美提出交涉。最后商定：兰斯签降只算预演，正式签降由对德作战主力前苏联政府的代表主持，地点在德国首都柏林，正式停火时间为五月八日零时。

5月8日经过一天的准备，到夜里24点整，前苏联元帅朱可夫，英国空军中将阿瑟·泰勒，美军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巴兹和法军总司令让·德拉特·德塔西尼等在签降大厅内就坐。德方正式代表德军元帅凯特尔和海空军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完字，已是9日零点四十三分了。待朱可夫等盟军代表，在德军签署的投降书上签了字，宣告受降仪式结束时，已是9日零点五十分。

此后，在习惯上，西方国家总是在5月8日即停战日这天，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前苏联则把5月9日看成是胜利日。

中国人揭开了“巴黎公社墙浮雕”之谜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那座有一少女张开双臂保护人群的浮雕墙，即所谓的“巴黎公社社员墙纪念碑”同“巴黎公社墙”一样，当作巴黎公社的象征，这是个极大的误会。关于这个谈话，是我国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师沈大力揭开的。1978年10月，沈大力第一次到巴黎在联合国组织的会议中任翻译时，看到了浮雕墙上的一段文字：“我们企求所希冀未来的，是公正，而不是复仇……”他产生了疑惑。他想起公社委员费烈牺牲前说过：“我相信未来会怀念我，为我复仇！”再看看少女背后的群像，有的着装并不像公社战士，而是凡尔赛军队的衣帽。他更疑惑了。对公社原则和历史负责的责任感，使他决心进行一次有意义的考证。

经过考证，他发现这座浮雕的作者保尔·莫罗·沃蒂埃并没参加过巴黎公社，参加公社的是他的父亲，保尔·沃蒂埃。人们长期误以为他们是一个人。其实老沃蒂埃1893年就逝世了，小沃蒂埃1871年刚出生，浮雕是1909年才雕成的。经过确凿考证，小沃蒂埃完全背叛了父亲，是个狂热的沙文主义者。那浮雕中所谓“献给革命的牺牲者”，实际是指被公社枪毙了的72个反动派人员。几经周折，他终于又查到了当时市议会“关于在甘必大庄园树立纪念历次革命受害者塑像的决定”，同时巴黎市议会还在1908年和1909年，两次慷慨拨款资助沃蒂埃建造石砌浮雕墙。真相已经大白，证明那浮雕与公社毫无关系。它的真实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法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决定由保尔·莫罗·沃蒂埃雕塑这堵模棱两可的浮雕，鼓吹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和解。那个妇女就是法兰西的象征，她所保护的是公社和公社的敌人，她反对复仇，充当调解

人。

而真正的公社社员墙，就是拉雪兹神甫墓东北角上，没有任何装饰，而只是布满了反动派枪洞的旧墙。事实上，在沃氏墙揭幕之后，当时幸存的公社社员都拒绝它，从不去那里献花。

目击巴黎公社起义的中国人

清同治年间（1870年）中国发生天津教案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派五日通商大臣崇厚前往法国赔礼道歉。随行译员张德彝，是当时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

1870年11月他们从上海出洋，到法国后先住在马赛，1871年3月15日，张德彝到达巴黎，正好赶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巴黎爆发。3月18日，张德彝记下了梯也尔派遣军队向国民自卫军的阵地巴黎城北蒙马特尔等处进攻；而部分政府军在人民力量的感召下倒戈向政府军进攻，活捉勒康特将军等高级军官等情节。19日，张德彝记下了巴黎公社宣布起义，梯也尔逃奔凡尔赛的情景。

他还记录了凡尔赛军队攻打巴黎，巴黎公社的战士在路障后面坚守阵地，旺多姆圆柱（又名凯旋柱）被毁等历史镜头，十分生动。

张德彝目睹了反动派追捕、屠杀起义者的场景。6月6日，他写道：“有一千八百余起义者被押向刑场，其中妇女有百余名，虽被赭衣，而气象轩昂，无一毫袅娜态。”

张德彝先后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了27个春秋，写下了长篇的日记，总命名为《航海迷奇》，共八卷约200万字。他在出使法国期间写成了《三述奇》，巴黎公社起义的史实，就记载其中。作为一个中国人，以纯然客观的笔墨写出巴黎公社起义的伟大壮举，成为东方人记载巴黎公社不可多得的史料和见证。

“巴黎公社”中译名演变经过

“巴黎公社”先后有过几个不同的译名。

最早的译名是“红头民政”，见于清朝翻译官张德彝出使法国见闻录《三述奇》一书。辛亥革命时期，《成报》和《新世纪》分别译为“巴黎暴动”、“巴黎民军议会”。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介绍巴黎公社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译名也日见纷繁。李大钊音译为“康妙思”；李达译为“法国地方自治团”；周恩来译为“巴黎共治团”。

1924年，瞿秋白在《在莫斯科期间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散文集《赤都心史》中第一次把它译为“巴黎公社”，为多数报刊和革命团体所赞同和采用。此后，此译名一直被沿用下来。

北平和平解放秘史

李宗仁借昔喻今。1948年，北平之敌已陷于我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何去何从，傅作义陷入深深苦恼之中。

过了些日子，傅作义心清平静些了。他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去找他，力主和中共谈判。但傅作义拿不定主意，白天同意了，晚上又变卦。几经反复，刘厚同生气地说：“你要把日月之光，弄成萤火之明！当兹关键时刻，如再犹豫不决，就会走入绝境！”年高气盛的刘老先生竟然因此一目失明，决心要回天津去。傅作义老友杜任之闻讯，日夜陪伴刘老先生，希望他在此时不要离开傅作义，以免使和平谈判前功尽弃。接受杜任之劝告，刘厚同留下了。

此时，李宗仁为结束北平行辕事务，曾飞北平小住。傅作义的心腹请李宗仁相机劝导。李宗仁受这一重托，与傅作义开诚相见。他深知，傅心境的痛苦和思想矛盾，比自己昔日在北平时更深一层。

“你是前辈。何去何从？望请多指教。”傅作义痛楚而恳切地求教说。然而李宗仁既不能劝他逃亡，又不能劝他投降，更不能劝他自杀。除此三条外，有什么灵丹妙药呢？他只安慰说：“宜生兄，局势发展，今天谁也没有回天之力，只有听凭你自择道路了。你要想到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车到山前必有路。还有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总统以华东南军政长官相许，要我撤退江南。德邻兄，你看可行否？”“你能把几十万大军带过去吗？即使你能带过去，蒋公能依赖你吗？”接着李宗仁向傅作义谈蒋介石如何用人：将（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大战中原时，阎拉拢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倒蒋，双方势均力敌，都派人到东北游说张学良。但当张学良接受蒋条件，使阎冯一败涂地后，一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陪蒋回京，就被扣押至今。……

“德心，目前已是紧要关头，怎么办？怎么度过难关？”傅作义问。“宜生，万一局势发展到那种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己选择道路，别人是挽救不了你的。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望你好自为之。”李宗仁回答。

傅作义准备和谈。一天夜里，屋里无人，傅作义私下问参谋长李世杰对时局的看法。李世杰说：“如果打仗，那是比较容易的，下达作战命令，鼓起勇气，准备牺牲就行了。和谈可不易，要做更多的工作，从上而下要有精神准备，首先是高级军官。”“谈何容易啊！”傅作义勉强讲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李世杰刚告辞出门，傅作义对着他背影喊道：“世杰，你把阎又文、王克俊、刘厚同找来！”

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王克俊是政工处长，刘厚同是高级顾问，他们都是傅作义的心腹。

他们都不知道突然传令叫他们来做什么，面面相觑，一言不发。最后，还是傅作义打破沉闷的气氛，说道：“我很费心思，找你们谈解决局势的问题。我提出个办法，请你们考虑。我想今天拍个电报呼吁和平，为人民请命，以促进和平。对中共，对蒋总统，我都发报呼吁。如果蒋总统还要我打，我就将兵权交给李文，然后我飞南京请罪，听候处理。你们觉得如何？”

大家听了，没人立即回答，都在低头沉思。李世杰看了一下傅作义疲惫而焦虑的灰暗脸色，咳嗽了一声，冷静地说：“总座，我看你这一着不妥当，也不是负责的办法。你留下几十万军队不战不和，说几句空话就跑了，别人怎么办？你走，把兵权交给李文，他能指挥得动吗？他是个兵团司令，中央派来的，绥远的军队是否能听他的？蒋介石叫你卖命，你到南京，他认为你是临阵逃脱，轻者把你扣起来，作张学良第二；重者军法从事——这很有可能。你呼吁和平，共产党赞同；可你不执行，放一炮就跑了，既怕打，又怕和，怎么能赞成你，怎么评价你呢？你向双方呼吁和平，而双方正在打仗。这样的举动，对不起北平人民，对不起几十万军队，对不起蒋介石，也对不起中共，最后连你自己也对不起。这个做法，我找不出拥护的理由。”“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傅作义听了非常感动，一再点头，深锁的双眉，立刻舒展了。

他终于决定派出两名代表，进行和谈试探。

聂荣臻会见代表。傅作义第一次派出的和谈代表是《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采访部主任李炳泉。当时傅作义还有幻想，打算恢复抗日战争时期那种国共合作关系，我方自然不同意。所以谈判未有结果。直到12月22日，他的精锐新保安35军被我一举歼灭，傅作义闻讯痛不欲生，又经杜任之、刘厚同再三劝导，才同意再派少将处长周北峰和民盟教授张东荪为代表去和我方谈判。周、张二位便在傅我双方精心安排下，顺利抵达蓟县我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当晚，聂荣臻司令员单独会见了周北峰先生。聂总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这次来很好。你看傅作义这次有诚意吗？”“我看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

次日上午，双方正式开始会谈。我方出席的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

会上，罗荣桓说：“希望这次傅先生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包括傅先生本人。”第五天晚上进行第二次会谈，内容主要是傅部所属军队如何解放军化，地方如何解放区化，以及文职机关如何改组和人员安排等问题。第六天上午10时，进行第三次会谈。双方继续对昨天讨论的问题陈述意见，主要是听取傅方代表的意见。下午，双方在刘亚楼参谋长整理的会谈纪要上签了字。会谈

纪要有个附记：所谈各项务必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周北峰立即回平复命。傅先生看了会谈纪要，一言不发，只是来回踱步，看样子是要拖延时间，也有想背城一战的可能。于是，周北峰与崔月犁数次联系：崔月犁与傅冬菊、刘厚同数次联系……三四天后，傅先生终于告诉周北峰说，要他与邓宝珊一起再去谈。

1月16日继续会谈。最后，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将军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了协议。

此后不久，北平回到人民手中，揭开了新中国成立的序幕……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之夜

60年前(即1931年)的9月18日夜里，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向中国东北守军沈阳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制造了举世震惊的“9·18”事变。北大营位于沈阳城的北面约4公里处，四周筑有2000多米长的土围墙，围墙外修有深2米、宽3米的堑壕。驻守在这里的中国东北边防军第7旅3个团，兵力约1万余人，是东北军中装备最精良的一个旅。但是，事变前，中国守军毫无戒备。当时，东北军最高司令长官张学良，离沈休养，正在北平的一个戏院里看戏。代司令，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市内经三街公寓忙于为他的父亲祝贺寿辰。驻守北大营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正在市里同泽俱乐部出席军界主办的水灾筹赈会。该旅的3个团长有两个在家住宿。

日本侵略者为了制造事端蓄谋已久。事变前，他们拟定了详细的武力寻衅计划，安排了实施爆炸的秘密别动队，连事发后由长春向沈阳运送日本守备队的编组列车也一一安排就绪。9月8日至17日日军公然在北大营门前及周围架机枪作攻城等演习。9月18日夜里，日军乘黑运动到北大营围墙外埋伏下来。夜22点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方向突然响起一阵爆炸声——他们按照预谋，派特工引爆了事先埋在距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村界路轨下的炸药，将东侧单轨炸开一个1米多宽的缺口。他们以此为借口，诬称中国北大营士兵破坏“南满铁路”，从而挑起战事。爆炸后10分钟，事先安排好由长春开来配合行动的14次快车按时抵达沈阳站。这时，埋伏在北大营围墙下的日军一跃而起，迅速冲进北大营营区。事变突发，北大营守军从梦中惊醒，猝不及防，许多人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被枪弹和刺刀击倒。一时间，火光冲天，炮弹呼啸，沈阳城一片慌乱。张学良将军身在北平，闻讯后心急如焚，一夜之间接连十数次向南京国民党政府通电告急请示。这时，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正在忙于加紧对江西工农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始终坚持对日本侵略军“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不变，屡屡回电张学良力避冲突。这样，尽管被日军暴行激怒的士兵自动奋起向敌人猛烈还击，英勇搏斗，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按“命令”撤出了北大营。沈阳城内的6000

余名警察也按“命令”全部被日军缴了械。

日本侵略军肆无忌惮，疯狂进攻，一夜之间便占领了整个沈阳城，不到一日又攻取其它城市 20 个，占地千余里。紧接着，日军南攻北取，于 12 月下旬进犯锦州，直逼山海关；于次年 2 月 5 日侵占哈尔滨。至此，仅 4 个月零 8 天的时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就踏遍了东北三省，一口气吞并了相当于日本本土 3 倍的中国疆土！从此，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沦为亡国奴，受尽了种种屈辱和痛苦。“9·18”之夜，是中华民族横遭蹂躏和备受屈辱之夜！令每一个中华儿女永志难忘。

四个“九·一八”

1930 年 4 月，一直欲和蒋介石较量的汪精卫把关内蒋介石以外的各军事集团的代表邀请太原，策划了一次扩大会议。会后，公推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起兵通电反蒋。这样，于 4 月便爆发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军阀大混战。史称是蒋阎冯中原大战。在这场混战中，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就成了全国瞩目的对象，张学良的向背，将直接关系到双方的胜负。因此，各派势力均纷纷派代表长驻沈阳，对张学良实行包围拉拢。

张学良经过几个月的观望、思索，终于在 9 月做出了支持蒋介石，进兵中原的决策，统帅三军，挥师入关。战争风云急转直下，果然前后不出两个月，阎锡山和冯玉祥便宣告失败，联名通电下野。至此，历时 7 个月的军阀大混战得以宣告结束。

张学良发出通电的那一天，正巧是 1930 年的 9 月 18 日，所以人称这是张学良第一个“九·一八”。这个“九·一八”使张学良平步青云，进驻平津，登上了全国陆海空副司令的宝座。

但谁会想到，仅仅一年，待第二个“九·一八”到来时，他竟一落千丈，遭到了整个民族的唾骂。这就是 1931 年现代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在此事变中，由于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

日本关东军这一阴谋得逞之后，欣喜若狂，为了纪念这一事变，他们把沈阳通往北平的火车，改为“9 点 18 分”开车。这就是所谓的第三个“九·一八”。这个“九·一八”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吞并全中国的野心。

经过八年抗战，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 月 2 日举行日本无条件投降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当签字仪式完毕之后，一位《大公报》的记者抬手看了下手表，时针恰恰指在 9 点 18 分。这第四个“九·一八”大约是对玩弄历史者的一种回报和惩罚吧！

